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12月15日第32期 总第242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42期

纪念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专辑

目录

【专稿】

- 唐 燕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随想
——为上山下乡运动 50 周年而作
- 孙佳雯 知青出身的政治变迁及其社会功能
——“红五类”、“黑五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偏差”

【评论】

- 慰 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
- 何與懷 也谈那场“知青运动”——从长诗《理想之歌》说起

【怀人】

- 郑 义 怀念甘铁生
- 鲍国芳 许晓鸣 我们的同学闻佳

【书评】

- 马昌海 知青的贡献与收获——读冯同庆的长篇小说《敕勒川年华》

【书讯】

- 刘豫徽 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敕勒川年华》问世

【资料】

- 易海涛 资料·内容·理论方法
——中国知青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本刊声明】

【专稿】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随想

——为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而作

唐 燕

一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甘肃日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文，并在《编者按》中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这段指示与《甘肃日报》文章的关联性令人惊讶：该文报道并肯定了甘肃省会宁县安排其城镇无业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疏解就业压力的作法，毛泽东的指示却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毛那里，对仍在积极响应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的大中学生们，已然被等同于会宁县里那些未必受过中等教育，已是成年人的“无业居民”了。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再源于“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也不再是“大有作为”这个激励知青的精神动力，而成了以思想改造为宗旨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实际上，文革前十年的学校教育、社会倡导，特别是1964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提出，已经基本成就了我们知青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和革命情怀，为我们走与工农相结合之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可是这段以“再教育”为上山下乡运动首要特征的最高指示改变了以往上山下乡的性质，还把知青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青年降低到了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知青与贫下中农不再是相结合的平等关系，在有些地方“再教育”甚至被等同于劳动改造，知青回城探亲时也往往被当作盲流防范、

排斥甚至驱赶。在这种情况下，灰溜溜的我们不可能像大多数文革前的下乡知青那样充满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神圣使命感和大有作为的壮志豪情了。

二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马列毛向工农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论”自相矛盾。

早在1844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指出过，先进理论不会自发产生，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灌输。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也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性和地位马克思则有明确的阐述：“无产阶级由脑力无产阶级和体力无产阶级两部分组成。”“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同样是雇佣地位，在阶级性上没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大量知识分子无产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些知识分子因为看到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而转到了工人阶级一边，加上知识分子本身具有的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所以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宣传组织民众，知识分子也需要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并在相结合的过程中学习他们的斗争精神和组织纪律性，克服自己的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才能形成一体化的、强有力的革命队伍。

关于农民，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小农的经济地位既决定了农民的革命性，也决定了他们是一个有先天缺陷的二重性阶级，是带有保守性的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无产阶级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成为农村中的力量”，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

毛泽东是靠贫苦农民打天下的，他说“农民中蕴藏了巨大的革命潜力”，“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同时他也认为，由于“农民的小生产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那么，作为小生产者、“中间阶级”、并非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代表、需要不断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的贫下中农，有资格有能力对知青进行再教育吗？

三

然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又理所当然，因为贫下中农不仅是我国各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依靠的主要力量，而且文革中还被推上了上层建筑的舞台，进驻并领导了学校、文化、科研和医疗等单位。贫下中农的阶级身份也被高度抽象化、政治化和道德化，成为响当当的资格认定和政治评价。

讽刺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贫下中农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就是工农业剪刀差、城乡二元结构和国家工业化巨大成本的严重受损者，其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都十分低下。

无疑，同任何教育一样，“再教育”的宗旨应是教书育人，除了传授知识和技能，还应对受教育者进行人文方面的教化培育，使他们具有健全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那么，正受着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制度严重制约，又刚刚经历了三年灾难，全部精力都耗尽在最低求生的艰辛中，早已看出“社会主义新农村”虚幻的贫下中农，会给他们看来是两个世界的“城里的学生们”什么样的“再教育”呢？忆苦思甜是贫下中农被无限透支的“再教育”保留节目，可是贫下中农给知青回忆的却往往不是解放前的而是大跃进时的饿肚子之苦。或许，这就是答案吧。

四

由于“接受再教育”的定位和知识的贫乏，知青给农业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劳

动力过剩的农村带来的益处有限，却因客观上跟农民争地争粮争工分而必增加农民的负担，损害农民的利益，毛泽东对此是清楚的，所以他要求“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由于上山下乡本就逆历史潮流而动，加上以一轰而上的运动方式展开，缺乏整体部署，没有长远规划，具体管理不善，结果“再教育”仅进行了四年暴露出的问题就极其严重。知青家长李庆霖向毛泽东说出了知青生活很艰苦，老百姓的日子很艰难，基层干部很腐败的真话。从毛的回信“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表明，他对知青的处境了然于心。

尽管随后召开的长达两个月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订了一些有关知青的口粮、住房、医疗等问题的政策措施；变有些地方的分散插队为适当集中；明确了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还决定严厉打击各地迫害女知青的犯罪分子等等。从而多少统筹解决了一些知青工作方面的问题，但是该会议又不得不再次拔高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以便继续推进上山下乡工作。

虽然上山下乡运动的大逆不道、劳民伤财、给知青带来青春荒废身心伤害、给知青家长带来的负担和怨气、给社会各层面造成的混乱早已显现，可是在当时的体制和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弊端，没人敢于公开怀疑甚至否定“再教育”这条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指示，更不可能有允许知青返城一类的政策。

1976年2月，毛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报告上又一次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可见在他给李庆霖复信的三年多之后，知青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粉碎四人帮后，上山下乡运动最终以“胜利大逃亡”，大批知青通过真假病退、困退，真假离婚、结婚，转插、顶职等种种手段羞羞答答地收了场。

五

文革大“破”之后，将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毛泽东早在《五·七指示》中就把后来“一月革命”时他提出的“中华人民公社”的蓝图勾画出来了。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在当年5月7日给林彪写的那封“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的信，即《五·七指示》。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又在其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里公布并阐述了《五·七指示》。

该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按照《五·七指示》，这个“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每个单位都要有工、有农、有学、有兵，自成体系自给自足，随之各行业间的专业区别逐渐消失。

显然，这种以小农思维改造社会的构想是继1958年“把工农商学兵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之后的又一个空想社会主义模式，是不从发展经济入手而代之以用行政手段改变社会结构的轻举妄动，是与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是在社会远没有达到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人民觉悟极大提高的情况下，臆想出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宗旨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这个乌托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培养“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和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目的，并非有人认为的是为给当时滞留在学校的四百多万大中学生找出路的权宜之策，而是毛泽东早已有的战略部署，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运动，不具偶然性、突发性和未预见性。

事实上，只要社会发展未彻底停滞，城镇的劳动力市场就必有需求。从1968年起，各地的企事业单位就开始不断招工。统计显示：文革十年间共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包括被抽调的知青）进入城市，而与此同时每年的中学毕业生被源源不断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

这种城乡劳动力的逆向对流，显然无法用解决就业的经济动机自圆其说，只能是“再教育”的意识形态动机。

六

为了杜绝私欲，培养“亿万共产主义新人”，文革中最常用的口号和作法是“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然而，人性之恶主要靠制度约束，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激发人性善，使人人充满爱心以真善美为荣；反之却会使天使变成魔鬼，社会充满戾气，不干坏事不参与恶行就几乎无法生存。因而我们应该做的是构建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挑战上帝，创造新人类。

没有人有资格有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掌握着正确的意识形态，没有人是意识形态的最高裁决者。法国罗伯斯庇尔的“改造人性”、列宁的塑造无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和个性的“苏维埃新人”、以及毛泽东培养“亿万共产主义新人”的实践统统证明：人性不可改也不能改，任何教育改造人性的努力都必然失败，用强制手段改造人更会酿成暴力和专制。那些既不受制度管束也不受道德约束的统治者个个都是专制独裁者，他们肆意摧毁传统文化，把被统治者要么从肉体消灭，要么引向奴役之路，其结果不是理想国而是古拉格。“好学生”波尔布特在红色高棉改造金边“四一七新人”的运动最典型。他不仅杜绝了商品，废除了货币，还屠杀了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摧毁了城市，甚至消弭了家庭。

文革初，红卫兵怀着反修防修的真诚愿望奉旨造反，结果犯下很多丧失人性的罪恶。曾为打开文革局面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红卫兵们后来变得越来越“不听招呼”，以致于令毛大失所望，其实那正是他打开潘多拉盒子的恶果。下乡后，在艰苦的生活以及精神的困惑、迷茫和痛苦中，无论是接受了两三年还是十年八年“再教育”的我们，不仅没能杜绝私欲，改造人性，反而为了生存大大激发张扬了自私的天性。

七

五十年代毛泽东把思想改造的重点放在旧知识分子身上。自六十年代起，解放后培养的青年学生成了他的忧虑，他认定建国以来，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

实际上，与共和国同龄的我们这一代是中共亲自培养，在五星红旗下被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一方面，我们从小受到共产主义、革命理想、英雄主义、牺牲奉献精神等的红色教育，具有单纯、正直、勇敢、刻苦努力、奋发向上、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等优秀思想品质。另一方面，由于阶级斗争是我们的主课，由于我们身边的阶级斗争被搞到了常态化、普遍化、绝对化甚至暴力化，我们已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一切，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赋予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义。

还由于受到“三忠于”“四无限”的强化教育，我们对领袖越来越迷信，并不断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中汲取精神力量。我们时时向党交心、处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结果思想僵化轻信盲从，没有独立的思想和灵魂，一心一意甘愿作党的驯服工具和毫无个性的螺丝钉。

在脱胎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的新中国，虽然理论上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但实际上封建主义的打江山坐江山吃江山、王朝专制、三从四德、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宗族宗法门第观念、血统论等种种封建余毒根深蒂固，随处泛滥。反封建本该是我们首要、长期且艰巨的任务，我们却只专注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我国并未有过象样的资本主义阶段，不可能复辟不曾有过的东西。人为地防止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实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为封建主义招魂。

事实上，我们知青一代并没有受到过多少资本主义的教育，对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我们并不知悉。我们不清楚正是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和发展商品经济促成了落后的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不了解“文艺复兴”这个近代西方伟大的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不通晓对有力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宣扬了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观念，覆盖了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更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以及在一次次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不断完善的人生而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珍爱生命等普世价值观正是肃清封建余毒的有力武器闻所未闻。

由于停课闹革命，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既没完成学业也未成年，拥有的知识既不完整更不系统。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我们都没有基本的认知、没有视野、没有去伪存真的研判能力，也未能奠定好终身学习的基础。我们远没有旧知识分子的民国底色、知识底蕴和批判现实的精神，却和他们一样背负着知识原罪接受思想改造和“再教育”。

八

知识分子曾被蔑称为“臭老九”，他们的知识被视为不切实际，他们的教养被看作是虚伪和无用之物；他们的惯于思考以及怀疑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更被看作是对权力的挑战。“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是知识分子的罪名之一。其实，因为科学家、教师、医生、律师、作家、企业经理、政府管理人员等知识分子是受过专门训练，有较高专业知识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从事的是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法律、管理等的策划、组织和服务的工作，自然不会也不必会种田和做工。

“使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个口号的内涵是：劳动人民没有知识，所以要知识化，而知识分子不劳动，因此要劳动化；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劳动，否则就是脱离了劳动，脱离了劳动人民。结果，强迫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成了改造惩罚他们的手段之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主要是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完成对知识原罪的救赎。

把体力劳动当作惩罚本身就是荒谬的，因为这样一来体力劳动成了犯了罪错的惩处措施，这其实也是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农大众的羞辱，还把贫下中农推到了尴尬的境地：因为以这样错误的认知，天天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贫下中农只能是反面教员，还何谈对知青进行”再教育“？

九

在农村，我们知青落到社会最底层，亲历了农民的艰辛。我们懂得了衣食之难稼穑之苦，或多或少学到了农民勤劳朴实、善良忠厚、勤俭耐劳、务实隐忍等优秀品质。我们看到了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下，广大农民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被剥夺，了解到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村发展和对农民的束缚，知道了农民的所思所想，从而不同程度地完成了从理想到现实，从被愚弄洗脑到独立思考的转变。与此同时，我们也向贫下中农学到了诸如边喊着学大寨边瞒产私分的“生存智慧”。

上山下乡使我们至今对农民怀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心和由此奠定的底层农民的立场，更与贫下中农结下了深情厚谊，以致值此今年下乡50周年之际，知青们回访第二故乡成了一股潮流。我们留恋老乡赋予我们的质朴的生活和与命运抗争的本真的人生状态，留恋与父老乡亲朝夕相处时所形成的淳朴情感，留恋曾经付出过青春和汗水的土地。上山下乡的经历也使我们变得成熟，还培养了我们一些受用终身的良好品格。

但是所有这些不足以证明“再教育”的正当性。由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我们远离现代文明、信息极端闭塞、思想资源匮乏，我们没有外来元素作比较，更别无选择；由于我们与之朝夕相处的只是因同样闭塞且文化水平低下而不可避免造成的保守、偏见、目光短浅的农民群体。所有这些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有恢宏的视野，不可能接

受新思想新观念，我们并没有取得现代文明意义上的进步，达到不了人生的高度，只剩下工具人格。在农村的数年我们用青春和血汗积累的只是一些农业社会的生活经验，形成的是小农思维。

与其说我们在农村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如说我们接受的是中国农村国情民情的“再教育”、农村生活的“再教育”（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教育最重要功能之一是传承优秀的先进文化，而我们被浸润的只是落后的农耕文化，满足不了现当代社会先进文化延续和更新的需求。

即使那些当年知青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也不过是更为自律，更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也就更禁固了自己的思维。他们一门心思带头大搞集体经济，狠狠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极力限制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以为只要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搞好了，一切就都好了。他们沒有也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理念，更不可能有对“体制性障碍”的认知，他们的视野阅历、思想方法和理想境界都与现代文明不搭界。知青的事迹和苦难没有英雄史诗般的意义，若不认真反思就更加毫无意义。

1977年后，只有百分之十的知青接受了高等教育和各类继续教育，从而增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另外百分之九十的知青因为沒能受到完整的基础教育，知识和人格塑造上的欠缺难以弥补，成了终生遗憾。

十

文革前的1965年7月，尚未受到“再教育”束缚，一心一意要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人大附中李秋梦、张木生、陈晓农、李零等十几位高中毕业生到内蒙古临河县狼山公社插队落户。不久李秋梦自荐当上了生产队长，领导他们队的农民试行小包干，他们给各家增加了自留地，还在生产队办起了油坊、磨坊，又组织泥瓦匠、皮匠、鞋匠、画匠等搞副业，结果不仅使队里的粮食增产了十多万斤，还大幅度提高了工分值。

李秋梦们当然不会被树为知青模范，倒是张木生因反思我国农村体制和发展道路，并写了长达三万字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而被捕入狱。

自有上山下乡，就有知青对上山下乡乃至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问题的探索和记述，那些佼佼者主要从禁书中寻找思想资源，并结合自己所处的农村实际对中国命运和自身处境进行思考。张木生的思考不是唯一的，却可能是继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知青运动的方向》之后最有深度的，当然也是小范围的、私下的、绝不可能见报的。

十年文革期间，只有高红十等四位知青创作的政治抒情长诗《理想之歌》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朗诵后反复播出，还被正式出书。其中“贫下中农帮我校正着理想的航线”这样主旋律的诗句当仁不让地使《理想之歌》成为官方推出的“再教育”正统范本。

其实当时不乏优秀的知青诗作，最受知青们喜爱的是食指的《相信未来》，尽管它被江青点名批判，但连同他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以及许多其他知青写的“地下诗歌”一直在知青中广为传颂。

上山下乡运动塑造了一批知青典型，他们起初单纯激情，满怀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后来被迫充当了工具。他们作为XX代表、XX委员所发出的各种豪言壮语不可能对广大默默承受着苦难的草根知青有什么激励作用。他们被推上高端后变成了政治符号，升官上位身不由己，婚姻爱情也往往受限，还由于程度不同地卷入了文革上层的权力斗争，成了可叹可怜的政治牺牲品。后来为了纠偏，也为了“巩固再教育成果”，他们中的大部分被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反思总结上山下乡运动不得不从他们身上跨过去。

十一

1979年10月邓小平指示：知青回城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这意味着，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以及在解决知青回城的问题

上不再坚持“再教育”的理论和方向。正是有了这个拨乱反正的政治基础，极为棘手的知青返城问题得以与大力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融为一体，最终平稳解决。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已过去了五年的1984年，早已摆脱了“两个凡是”思想桎梏仍落户在山西的一些北京知青，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感觉到争取回京的机会来了，并很快付诸行动。他们在《知青简报》发表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其要害是“再教育”，“再教育”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否定文革必须否定“再教育”。“再教育”的形成和发展是文革的产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彻底否定了十七年的党的教育路线，否定知识的作用，把人类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反动的，谁占有越多就越反动，就要接受再教育，它使尚未学完知识的中学生中断学业，使数千万人才毁于一旦，连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比不上二十世纪的这场悲剧。在请愿的游行集会上，他们还拉出了“请求党中央对文革中‘再教育’问题给予明确答复”的横幅。

这些北京知青正是在党中央全面彻底否定文革的前提下，明确提出彻底否定“再教育”理论，进而彻底否定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给仍在外地的北京知青落实政策准予回京的诉求。从1984到1988历时四年，他们终于有理有利有节地成功维护了全国知青的合法权益，终结了上山下乡运动，为中国知青史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一页。

十二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大搞政治运动的治国方略，误国害民。只有抛弃毛式的政经模式，中国才能发展。为了缩小城乡差别，首先要满足“耕者有其田”这个历朝历代农民理所当然的最基本要求；还要废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使工农业发展的步调尽可能协调、稳健，在两者的发展速度上前者不可过快。

小农社会产生不了民主、自由、法制和人权，新中国建立不久的我国农村有着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陈规陋习，充斥着大量文盲半文盲，自身尚且不是“共产主义新人”的贫下中农承担不了“再教育”的重任。靠把大批知青和其他人下放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办法是倒行逆施，缩小不了城乡差别。

单一呆板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使我国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根本原因，允许个体私营经济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才能广开就业门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2.6亿农民向城市迁徙的实践证明，只要政策得当，即使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也完全可以实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

这些教训的取得是以侵害广大农民的生存权益和牺牲一代知青为代价的。

如今，在彻底否定文革和彻底否定以“再教育”为宗旨的上山下乡运动方面，我们依然任重道远，因为文革的根还活着，随时会长出邪恶的新苗。■

【专稿】

知青出身的政治变迁及其社会功能

——“红五类”、“黑五类”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知偏差”

孙佳雯

按照“出身”来给知青分类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出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在中国革命年代的语境下，所谓“出身”，指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血统”，其来源与评判标准，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阶级路线”政策有关。早在1930年代初，毛泽东就根据对中国农村阶级的分析，制定了依靠雇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¹。1950年代中期，中共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号称消灭了地

¹ 毛泽东：《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1933年6月14日。

主阶级、富农阶级、资产阶级。然而，“阶级路线”并没有从此消失，反而通过渗透到了青年阶层而扩大了影响。简而言之，官方根据“阶级路线”的原则，将青年家庭出身分成了“好”与“坏”，以此决定其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权益：一方面，为出身好的青年提供种种优惠便利；另一方面，对出身坏的青年的人权（诸如教育权、就业权、婚姻权，以及对前途的选择权）进行了限制和剥夺¹。

我们在田野中经常听到诸如“红五类”、“黑五类”的说法。实际上，在很多革命年代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口述中，“红五类”和“黑五类”成为了很有辨识度的政治身份标签，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生命历程。大多数文革研究和上山下乡运动研究，也是按照“红五类”和“黑五类”的标准为革命年代的青年阶层的政治身份做了大致的划分。关于知青群体对“红五类”和“黑五类”两个概念的“滥用”，我们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政治出身的概念，并不是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其二，虽然“红五类”、“黑五类”作为政治标签曾经频繁出现在革命年代的官方话语之中，但是其意指与当今天大众日常用语中的意涵普遍存在着“认知偏差”。

早在1950年代初，“三反五反运动”、“反胡风运动”、“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时候，从城市到农村，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被揭发出来，他们的子女处境也随之恶化。到了“匈牙利事件”发生和“去斯大林化”被提出的1956年，自下半年起，国内一些地区相继发生学生闹事事件。引发学生闹事的原因，首先是学校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教学水平低、课程安排不当、伙食卫生差、招生时虚假宣传等，其次是升学就业的压力空前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957年1月至3月的内部讲话中，至少六次提到青年大学生的家庭出身问题²，他认为闹事风潮与“百分之八十”（这个数字是毛自己的估计，并没有

¹ 刘小萌：《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2012年香港知青会议论文。

² 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上的一次讲话》（1957年2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和各省市委宣传部长谈话》（1957年3月6日），《关于思想工作问题》（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三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在山东省级干部会上的报告》（1957年3月18日）。

直接的事实依据）学生的不良家庭出身有关，这些人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因此必须加以提防。于是，到了1957年6月的“反右运动”中，大量的高校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¹。在1957年9月中共对全国高校的调查报告中，显示“右派学生”的家庭出身“普遍不好”（剥削阶级、职员、自由职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占比例高达75.41%）²。这一统计结果让中央产生了警惕，一方面，坚决贯彻“阶级路线”，对学校进行“整改”，下放大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进行严厉的压制，包括限制升学、限制申请助学金、限制入团、限制就业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路线在青年工作中被大量滥用，一方面表现为官方政策的指定与强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级工作人员的随意发挥。在两者的彼此呼应下，对“出身不好”（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子女、资产阶级子女，等等标签）的青年的歧视迅速蔓延，具体表现为：从大学扩展到中学；从城市扩展到农村；由“黑五类”株连更多无辜，许多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被一概视为“剥削阶级家庭子女”，受到歧视³。在划分“黑五类子女”范围的时候，普遍存在“查三代”（祖辈、父辈、本人）的现象，许多地方将学生家长的出身当作了学生本人的家庭出身（比如学生家长本来是革命军人、干部、教师、职员，学生的出身却被填做地主、富农、资本家）。“查三代”现象的泛滥，是直接造成知青一代对自我政治身份认知的混乱的原因之一，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厘清其政治身份带来了困难。

可以说，“阶级路线”的政策，不但造就了大量的政治贱民，为文革准备了思想、政治和组织条件，更重要的是，为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大批后备军，即大批的“可教子女”的出现⁴。在运动初期，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要求下乡并非出于“革命觉悟”，而是走投无

¹ 自1957年夏至1958年春，共有552877人被打成“右派分子”。见秦相启《摘“帽”》，《党史博览》2001年1期。

² 团中央大学工作部：《高等学校学生、团员的政治情况的若干调查》，团中央办公厅编：《团的情况》第221期，1957年9月30日。

³ 刘小萌：《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2012年香港知青会议论文。

⁴ “可教子女”指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指的是所有“黑出身”的知识青年。关于“可教子

路之余的无奈选择。当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了中小学毕业生唯一的出路的时候，“阶级路线”甚至在知青群体内部又衍生出了新的歧视，比如兵团知青对出身的要求普遍比插队知青要高。在我们的访谈中，曾经不止一次听到兵团知青表示“我们去兵团的，都是出身好的，红五类，黑五类兵团是不要的”或者“我们兵团在边境地区，苏俄边境，战略要地，对出身是有要求的。”

在对中国革命年代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普遍真理”，即：但凡事件皆有政策，但凡政策皆有例外。在革命年代的中国，我们从未见过任何从上到下，在全国各地范围内都以统一的规范被实行的政策。即使在兵团，也有自认出身“一般”的青年（小地主、职员、知识分子）。实际上，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黑五类”知青普遍明确地知道自己是“黑五类”，但“红五类”（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知青）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是红五类。在访谈中，黑五类的知青明确地表示自己曾经因为出身受到过歧视，他们也倾向于强调自己的“黑五类”身份。但是许多工人家庭的子弟并不认为自己是“红五类”，在他们看来，所谓的“红五类”应该是那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且从中获益的人。而在“红五类”和“黑五类”之间，还存在着广泛的中间阶层。以本研究中的样本为例，在“绝对的红五类”（以红二代为代表）和“绝对的黑五类”（以黄埔军人后代为代表）之间，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区域¹。有些知青的出身，我们很难定义，比如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后代，显然他们不属于“地富反坏右”，但是他们也没有像红五类一样，能够参与学校里的政治活动；比如有的知青父亲是共产党干部，母亲却因为属于地主阶级被下放了，理论上来说，他的成分应该随父亲，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拒绝承认自己是“红五类”，他认为自己的“积极”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和觉悟，和父母没有关系；甚至有的红二代在文革中突然变成了“狗崽子”，直到父亲恢复原来的身份才不再受到歧视，反而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比

¹ 女”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到的压迫和摧残，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第203-210页。

¹ 在这里，我们假设这种“绝对”是存在的。其余的情况分布在两个端点之间。毛时代的政治朝令夕改，并且具体地方的实施情况也有所不同，我们根本不可能穷举所有的情况。

如习近平）。

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与“阶级路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标准的混乱有关。以“工人家庭出身”为例，这个概念在毛时代就非常的复杂，并且时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民间文革研究者何蜀曾提到：“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中的‘雇佣劳动者’，而是一个完全变形的复杂概念。从理论上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但实际上，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却又被分割成了许多在政治、经济地位上有很大差别的等级。从工作单位的体制性质看，有‘全民所有制’，其中又分为‘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此外还有属于‘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从个人身份上说，则有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还有外包工、轮换工、季节工等等的区别，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完全不同。一般说来，等级越高的，政治经济地位也越高，反之亦然，比如处于最低等级的临时工或街道小企业、街道运输队中的工人，就基本上是经济收入最少、政治条件极差的人，这类人或者是“出身不好”而不能升学或进国营企业工作的青年，或者是本人曾被劳改、劳教或被原工作单位开除的人员，或是‘杀、关、管’的成员的家属，或虽非“杀关管”却得不到信任的前政府官员或前国军军官的家属等等。因此，‘工人阶级’的‘红五类’子弟出身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人的父辈虽然确实是工人，但其祖父辈却有人在土改、镇反等运动遭到了镇压；有的人父辈虽是工人，却在民国时期（如在军工、邮电等要害部门）参加过国民党，或者曾经参加过民间帮会组织（如四川的袍哥），又或者在解放军打来之前参加过地方上的‘保境安民’自卫队之类后来被视为的‘反共武装’等等；还有的则是在中共执政后的政治运动中曾挨整受贬，有的是从干部身份被贬到基层当工人，有的是因各种不同原因受过处分，尽管没有被戴什么政治帽子，但这样的工人也是各单位‘组织’上了解和掌握的不可靠对象；还有的是直系亲属中有‘杀、关、管’成员，有‘海外关系’，或者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被‘组织上’暗中定为‘中右’、‘有右派言论’之类记入档案的罪名。总之这方面的情况十分复杂，所以如果只说是‘工人出

身’，那就很难弄清其家庭当时真实的政治地位。”¹总之，在我们对知青口述的研究中，发现了“客观出身”和“自我认同”之间差异的普遍存在。知青话语中的“红五类”、“黑五类”并不是文献中所谓的“革命干部、军人、烈士子女、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而是一种对政治资本的自我判断。很多工人出身的知青不认为自己是“红五类”。有些黑五类子弟也不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是所谓的“政治贱民”。这意味着，官方话语与个人认同之间，存在着认知偏差。如果我们按照红五类和黑五类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份，与知青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并不一定一致。在过去的知青研究中，从未有人提到过这一点，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过去的知青研究对象大多是史料，而不是“人”的缘故。

结合知青的口述和对官方政策的分析，我们认为，所谓的“红五类”和“黑五类”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用这个标准来划分知青，其实并不准确。这种建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这是讲述者根据自己的政治资本所做的、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具体可分为：明确的红五类、明确的黑五类、以及两者之间比较模糊的“不太好也不太坏”的政治身份；其二，这是由研究者根据史料和文献进行的建构，基于革命年代复杂的、瞬息万变的、林林总总的政策，这种建构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简化，主要是为了强调“红”与“黑”之间的、在政治地位上的对比。在厘清了“红五类”与“黑五类”的迷思之后，我们考虑用“政治地位”的高（红）与低（黑）来为我的访谈对象组做一个分类。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分类方法只适用于本研究中的访谈对象，对于更广泛的知青群体来说，我们的分类方法不一定完全适用，需要结合具体的群体进行具体的分析。

我们首先对本研究中的知青的政治地位等级做了一个简要的区分²。

政治资本与活跃程度	社会阶层（出身）
-----------	----------

¹ 与何蜀的访谈，2018年9月15日。

² 我们对知青“出身”的归纳是很粗糙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和“右派”分子的定义太过复杂。比如有些知识分子是“右派”，有些则不是。有些知青在下乡的时候年纪很小，对父母的政治身份也说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强调，这个分类标准仅仅是基于本研究中60位知青的口述整理的。

高（红）	较高	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红二代”
	较低	中小学教师子弟、工人阶级、贫农阶级
中（灰、麻）	较高	下放干部子弟
	较低	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学者）、职员
低（黑）	较高	右派子弟
	较低	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后人

【表4-1】本研究中的知青的政治地位等级分类。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将参与访谈的知青的出身和下乡地点做了一个分类。

下乡地点 出身	兵团	插队	总计
红	40	3	43
中	6	1	7
黑	9	1	7
总计	55	5	60

【表4-2】参加访谈的知青按照出身和下乡地点进行分类。

以上，我们对本研究中接受访谈的知青按照多种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特别是按照“出身”进行的分类，让我们意识到，对知青话语中的“革命语言”的解读，需要尤其谨慎。关于对知青口述中的“红五类”和“黑五类”的思考，或许可以为之后的知青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评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

慰祖

为什么要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种意见认为其动因主要还是经济因素。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政治因素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下面我来简要梳理一下这个问题。

一 回乡知青和以青年农民为主体的志愿垦荒队 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者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中小学毕业生回到自己在农村的家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下了一段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不论是文革前还是和文革中，回乡知青都远远多于城市下乡知青。估计至少是城市下乡知青人数的一倍，约三千万到四千万。其中的邢燕子、董家耕就是当时家喻户晓的模范代表。

文革前，在共青团中央的倡导下，经政府统一部署，一些省市学习社会主义苏联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组织了以青年农民为主体的志愿垦荒队，这其中也有部分城市知识青年的参与。如北京青年参与开发北大荒，浙江温州青年开发大陈岛等。

二 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初具规模

文革前全国共组织动员了近130万知青下乡，其中有近百万是1962—1966年下乡的，不少是没考上高中或大学而成为“社会青年”后被动员下去的。他们中有很多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主要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资本家的子

女)。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上海知青中，就有相当多的人属于这种情况。直至1970年代末，文革前的知青鲜有正当途径回城，招工招生不对他们开放。因此，“下放”对他们来说更是一种“移民下乡”。

上海、江浙等南方知青参加新疆军垦的身影，曾经出现在1964年10月上演的一部彩色记录片《军垦战歌》之中，其中的数首旋律优美的插曲传遍了全国。1965年，成绩优异的武汉高中毕业生易中天，受苏联小说《勇敢》的影响，放弃高考，自愿报名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江西的共青城也是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关怀下，由城市知青为骨干建立的；再如北京知青在文革前就有去宁夏军垦农建13师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临河县插队的。

在志愿下乡的城市知青中，出身于北京工程师家庭的侯隽是榜样，其中还有张木生、陈晓农等高干子弟。这就初步形成了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¹

三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动因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伴随着城市化，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能够提供大量劳动力资源的只有农村；在农业现代化中不断产生的大批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众多中小城镇也在乡村建立起来，一大批农民就逐渐转化为城市居民。在如今的美国，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2-3%，由于生产经营的机械化信息化，采用高新技术的农牧场创造了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再加上政府的高额补贴，工业反哺农业，少数美国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供应本国人民有余，还可以大量出口。

在我国，随着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原本可以通过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小集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来拓宽的就业渠道被堵死，致使城镇青年的就业门路越来越窄。1952年城镇个体劳动者有883万人，

¹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一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邓鹏：《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重庆出版社2009.10。

到1978年减少到仅15万人,¹政府几乎找不到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同时，“一·五”时期的城镇就业政策，伴随着“三大改造”的进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造成了待业人员对国家的依赖。实际上，国家即统不了也包不起，许多人只好消极地等待就业，而许多行业又有待开发。这就造成了有人无事干，有事无人干的不正常现象。

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也大大限制了城镇的就业容量。新中国成立后，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据统计分析：当时的每亿元投资，用在轻工业能容纳劳动力1.6万人，用在重工业就只能容纳5000人。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直接引进苏联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越过了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工业发展阶段。

再次，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在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上，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这也大大削弱了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当然，造成就业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错误的人口政策使中国多生了数亿人，当今中国的劳动力总额为十亿人，而整个欧美的劳动力总额才7.3亿。这是建国后由于政策失误而留下的最大遗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妥善有效地解决十亿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本来就很低，大跃进和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更加剧了经济的停滞和破坏，城市中多余的劳动力，只好被送往更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边疆，以缓解城市的财政和就业压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世界各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批知识青年送往农村。

1963年6月29日到7月10日，中央召开了六大行政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指出：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一长期任务。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1964年1月，中央书记处讨论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

¹ 中国统计年鉴 [M]. 1985. 213.

问题，周恩来说，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知识青年主要采取插队的方法到农村去。¹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文革前关于知青安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动员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大体沿袭未改。²这就是说，由于人口政策和“大跃进”运动等一系列的失误，加剧了国民经济失调和劳动力就业的难度，即使没有文革，大批城市青年也是要上山下乡的。

1968年，中国已经积压了1250万“老三届”中学生，其中家在城市的有400万人，显然不可能短期内在经济状况下滑的城市里就业，他们只能分散到广阔天地去。

四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因

文革开始两年后，由于中学停课、大学不招生，企业基本不招工，数百万正处于青春期和政治分裂状态下的中学生一个不安定因素，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更有一些红卫兵组织闹派性、搞武斗、制造事端。解散红卫兵组织以恢复秩序被提上了日程。

从1964年起直到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经济因素（如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外，还带着一种强制动员性的政治涵义，是一条促进青年革命化、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辉道路；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简称“三大差别”），“反对修正主义和防修大业”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法国学者潘鸣啸认为：知青运动的根本动因，源旨建国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政治关系。最高领导人所主宰统领的意识形态，是驱使1700万知青下乡的决定性因素。若是由于文革中政府无法解决知青就业问题，因而造成1968至1969年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那么，何以解释当年在校的“老五届”大学生，也全部被赶往军垦农场？何以解释知青下乡后的

¹ 顾洪章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²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236页。

第二年，大中小城市均开始大量招工？

20世纪60年代末知青大规模下乡运动，源起于政府高层的四种动机。这四种动机，基本上属于以下三大类型：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的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社会秩序并强化最高领袖的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是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建设），另一是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潘鸣啸认为，用简单的经济利益来解释这种反文化反教育的政策，肯定是本末倒置的。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崇尚领袖迷信的国家，知青运动的发生绝不可能由单纯的经济因素决定。1968年以后，由经济困境造成的驱赶知青下乡自食其力的动机虽然继续存在，但下乡并不是唯一可以解决那些经济问题的途径。只有在某种基本由政治思想因素决定的发展逻辑内，才能解释这唯一途径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史实揭示，这次运动是领袖个人权威长期以来反知识主义及民粹主义的一次极端演绎。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上，乌托邦臆想的制造者，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这一表现出某种独立思考精神的社会阶层。仇视知识分子的潜意识，曾造成新中国当代史上多次对知识分子的挞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便是这一内心焦虑的极端体现，下乡运动不过是其中一部分。

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使党和政府自封为万能救世主，决不能容忍存在失业。一旦出现了失业，就不是面对而是习惯性掩盖。文革三年使得生产日益萎缩，政府财力日蹙，应付“吃饭财政”尚不及，不可能通过投资扩大内需提供岗位。同时，大学停办，高中不招生，而数届积压的中学生嗷嗷待岗，必须安置，必须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情急之下，毛泽东只能利用其“领袖魅力”先送他们下乡“就业”，既顾了政治上的面子，延续意识形态神话，也顾了经济上的里子——遮掩无法安置就业之实。■

【评论】

也谈那场“知青运动”

——从长诗《理想之歌》说起

何與懷

……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愿在这里/终身奋战；/为了实现阶级的理想，/我愿在这陕北的土地上/迎接十个、几十个/战斗的春天！/这时/正是在这时，/我才开始填写/“甚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这张严肃的考卷。/我要做/我们鲜红的党旗上/一根永不褪色的/经纬线！……

这是长诗《理想之歌》的片段，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的工农兵学员在1974年初集体创作。诗很长，但都是反复强调的激越高昂的豪言壮语。当年，它可谓时代的最强音。在9月，它和当时已成名的诗人的作品汇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以它的题目为书名；1975年底，它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成配乐诗朗诵播出；1976年1月，它更获“殊荣”——得到《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样几经党的宣传机器隆重推介、赞扬，这首长诗在全国广为传诵，红极一时。

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最主要就是“革命”，人生的意义就在于献身于革命事业，革命人永远年轻，为共产主义奋战终身；和革命教育一起的是仇恨教育，就是“阶级仇，民族恨”，革命对象从国际的“帝修反”到国内的“黑五类”乃至“黑九类”，而“苦大仇深”者如贫下中农就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因而是必须依靠的对象；而这两点又出自于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的毛泽东“个人崇拜”。在伟大领袖“最高指示”指引下，所有知识者乖乖听命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不然就是“忘本”，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这就是《理想之歌》所表达所歌颂的最崇高最光辉最伟大的理想，也就是文革中那场致使一千七百万青少年中断教育上山下乡、那场人类迁徙史绝无仅有的、从1968年到1978年十年“知青运动”的思想基础和“伟大”意义。

毛泽东的革命是甚么样的革命呢？毛说过，“只有这种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毛这个历史观已为众多学者斥之为极其荒唐反动。无数史实证明，中国历代这种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无一例外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度摧残。毛心目中的中国革命本质上与农民起义没有差别，都是想自己当皇帝而已。所以，那场“知青运动”，本质上就是强迫知青吸取和保持底层“泥腿子”精神，蔑视精神文明和文化教养，以极其愚昧的心态接受对毛皇帝的忠诚臣服。

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多是被划为异己、受迫害家庭的子女和普通劳动者的子女，而当年有些人却根本不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什么“再教育”。君不见，毛的侄子毛远新走出哈军工大学校门就直接坐到省军级的位置，文革中成为“东北太上皇”。像毛远新那种“红二代”即便下乡，心里也“踏实”得很，用不了多久，便参军的参军上大学的上大学，接着也就成为当然的接班人。不用说，这种人肯定把上山下乡尽量美化。的确，在他们的履历上，这段经历称得上是镀金，完全可以是他们青春时代的一种美好回忆。他们当然“青春无悔”。但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那段岁月真可谓不堪回首。生活的困难艰苦，思想的困惑压抑，皆可想而知，无需赘言。让人痛心的是，当时不断出现知青死亡案件。就借用中国官方的统计吧，这已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仅1974至1979年，在全国发生迫害上山下乡知青等案件41290起，知青死亡人数25690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5899人，占死亡总人数的61.9%，这还不包括1967至1974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见中国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81年，第70-71页）。最骇人听闻的是女知青被强奸的状况。从各种官方披露的资料来看，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的“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中占据着最大的份额。例如，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上海审判志》记载：“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

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说了句“不无幽默”的话：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最后，经过知青1978年12月至1979年2月各种规模的绝食、罢工、游行、跪求，甚至集体卧轨抗议等等拼死抗争，国务院有关会议终于松了口。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汹涌澎湃的知青回城潮，能走的基本上都走光了。然而，对大部分已荒废了学业不再年青的回城知青来说，命运依然并不美妙。他们八十年代回城之后，又面临各种新的困难新的悲剧，普遍患上迷失于城市的孤独感、茫然感、被抛弃感。

知青一代是时代的陪葬品，对他们如何同情，如何为他们感到惋惜，痛心，都一点也不为过。但是，历史还要毫不妥协地说：知青一代不仅留着伤痕还应存自省。知青文学作家张抗抗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批判道：“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时代去承担，便轻易地将自己解脱。”她尖锐地指出，不要再仅仅说这代人如何无私奉献，真诚纯洁，其中也充满了出卖和告密、虚伪和丑陋。战天斗地，破坏自然环境，干得少吗？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并使其丧失生路，干得少吗？不要再说我们如何优秀，我们已被真正优秀的一代人跨越，也不要说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我们早已无力担负这样崇高的使命。我们曾经有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溃坍塌了。王小波的创作实践，也许与张抗抗的理论主张及其自省并无直接关系，但他在《黄金时代》关于知青的描写，所涉及的理性思考，与张抗抗同是先导。这是共同的一代的智性在共时态下的历时性追问。他们各以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方式，寻找到同一个问题的源头。

许多清醒者都说了，每个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纪念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青春都值得历史记住。或者说，人的青春只有附着于历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义的，这样的回忆才具有人类经验的价值。但也许，像张抗抗、王小波这样的清醒者是少数。这个现象的确很值得探讨：一些在农村葬送了青春回城后又绝非飞黄腾达的人，作为心理补偿，中

断一些时日的集体意识居然可以回来。他们顽强地追寻已经失落的青春集体，追寻岁月如歌的激情。他们的执着，让人动容。只是他们的歌声无人喝彩，只好自己寻找表演的舞台，也依然是自己为自己鼓掌。他们也居然附和说出“青春无悔”。或许，普希金的诗句，“一切痛苦的经历，都会成为亲切的怀念”，可以成为这种现象的一个解释；或许，还在于人们的选择性遗忘，将一段不堪的岁月有意无意地消抹掉，或者移花接木，使用历史的化妆术，将之唯美化；或许，他们的内心深处，可以用这几句诗描画：“说青春无悔/是因为无可奈何/要自我安慰”。这才是“青春无悔”四字的真正内涵！回首知青岁月，说青春无悔，他们哪里是欣慰充实？哪里是心满意足？而是在舔舐自己的伤痕啊！

或许，他们有一个思考误区——分不清反人性的“知青运动”与个人的难以抹杀的“知青经历”是两个绝对不同、应该分清的概念。1968年起始的“知青运动”在整体上从属于那场“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生时段、过程和主导思想，均脱胎于文革的形势变化和“继续革命”的政治路线，是文革的组成部分。就如同文革已被历史包括党的决议否定一样，“知青运动”的政治属性当然也是应该被否定的——都是根本性地违背了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和人民的意愿。不能因为一些知青有所磨炼，有所成长，有所贡献，不能因为他们极少数人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积极进取置之死地而后生，在此后的人生中成为各界优秀的栋梁之材，而反证“知青运动”的政治正确性。我们肯定在逆境中积极奋进，却不能歌颂人为制造的苦难。其实，我们今天对它进行反思，有一个很好的历史条件，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为这种具有欺骗性压迫性的反人性的实践作了定论，证明了这场巨大的社会实验是一场浩劫，而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则是一种利用党文化惯性所进行的系统的洗脑和欺骗。在“政治运动史”的框架中进行“反向思考”，也可求得关键的论证：“知青运动”曾是文革的“产儿”，但这个“产儿”的生长，即知青的境遇和心态，他们的反省、反思、抗争，包括他们的“堕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使文革走向解体的动因。

如果“十年浩劫”可以改为“十年艰辛探索”，那么“上山下乡”就可以美其名曰“青

年运动的方向”；而《理想之歌》就应该再度响彻云霄。遗憾的是，在革命破产，理想破灭，一切朝钱看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所有的倒行逆施都只能是一枕黄粱而已。■

【怀人】

怀念甘铁生

郑义

惊悉铁生去世噩耗，虽有精神准备，仍痛惜万分。

我们是老同学、患难之友。在太行山那个贫困的小山村里，我们有六年青春岁月相濡



以沫。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如你一样与我患难与共。好兄弟，你走了，世界顿时更为空虚。自1989年一别，竟然是28年过去。每次回大坪村，你总是想我，念着我，要拍许多照片发给我，跟我讲眼下的凋敝。过去我们曾栖居、夜读的窑洞和土房，已被荒草掩没。（约1968年离校插队之前，颐和园。右一甘铁生，右二郑义）你还捎来乡亲们的问候：告诉郑块儿，村里都好，能回来看看就更好！回来看看吧，老人们都不在了……我何尝不想到故人坟头上坐坐，到亲手耕耘过的山坡地上走走，竟是不可能。铁生此一去，与大坪的亲情断了，祖国也成了一个陌生的概念。过去是祖先生活、埋葬的土地，现在埋了亲弟兄，便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淡远了。老同学中，史铁生去了8年，甘铁生也去了，我感觉到了生的孤独。

铁生真死了。忆起我们在一起的往事，泪水就一滴滴流。我们不忌讳这个“死”字。经见过那么多“非正常死亡”，还怕这个字吗？只是很悲伤，心里一阵阵钝痛，明白是再难见了。这十几个钟头来，我不停地唠叨着，扭住上帝不停地问：主啊，你把我的兄弟弄到哪儿去了？

在清华附中，我们同级不同班。在农村时，同公社又同村，真是难得的缘份。同学们给他取的外号叫“甘鸡”，是调侃他干瘦得像只鸡。文革时就变成了“甘机”，是说他“机会主义”——遇事不表态，低调人生。认真想，他能表什麼态呢？狗崽子，出身比我还好，老爸是逃到台湾的反动军官！后来到山西太谷县大坪村插队落户，也就是被流放太行山。天高皇帝远，说话自由许多，但他也从未跟我谈过家史，半句都没有，想必有不少的酸辛。高中毕业考后，随即跌入血腥的文革大潮。我出身不好，他的出身更不好，想必也受了不少罪。

一个学校毕业，又一个村里当农民，一起度过了青春期前十年，同病相怜，甘苦与共，这样的弟兄世上有多少呢？

刚下乡，铁生就和我一起到县城文化馆去借书。我们想看的都成了禁书，封存在一间房里，一直堆到房顶。馆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就用大麻袋装，捆自行车后架上，七十里驮上山，借了不还。每日收工后，坐暮色初起的乌马河畔，一起读诗唱歌，天黑下来，在土窑洞里点上墨水瓶做的煤油壶读禁书，真是些值得怀念的日子。

在同学们中，他是最先做文学梦的。清华附中出了几个小说家，甘铁生、史铁生和我，都是在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但都算不得处女作。在大坪的日子里，他已经小作品见报了。张承志是发表作品最早的，比我们三个要早几个月，而且是在《人民文学》。其实还可以上溯到1966年那个难忘的夏天，张承志的文学处女作是“红卫兵”。

写小说是后话。最值得纪念的是我们在太行山上甘苦与共的日子。我和铁生一起度过了近乎流放的岁月，不是亲兄弟而胜似亲兄弟。两三年过去，同学们有的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有的当工人，有的回老家，渐作鸟兽散。到第五、六年，村里只剩下铁生跟我了。

我们想了条挣钱的路子——做家具到县城出卖。那时我已从大兴安岭流浪归来，学了一手木工手艺。铁生技艺稍差，受过我两次气。一次是圆木破板，我嫌他出力不够大，除了拉，还用力送锯。这不满他自然感觉到了，笑笑，放了手，坐一边去抽烟了。还有一次，最后安装成品时，他抱来几条凿好榫眼的桌腿，问谁跟谁是一对儿？我给他扔回去：你自己看看！铁生又是淡淡一笑，坐一边去抽烟。跟这么好的弟兄，竟然抖起了师傅架子！后来是否正式道过歉，完全



记不起了。虽铁生宽厚豁达，不计这些小事，却叫我难过了一辈子。

做家具去卖，缺的是木头。满山的树被“大跃进”砍光了，只能到山更大人更少的小村去搜求。记得是一个冰河初融的春季，（约1973年，进山拉木，出山沟上公路之前）我俩起了个大早，拉上两挂架子车，顶着星星进山而去。一村一村问木头，讨价还价，装车，往回走时已是初暮。再涉过几道冰河出了深山，上公路时，夜已深了。铁生体力本不如我，到此时已筋疲力尽。于是我拉较重的一车在前头，下坡飞跑，上坡冲上去。然后把车停在坡顶，返回来帮他推上坡。饿得实在挺不住，把仅剩无几的一点干粮连渣渣也吃得精光。抽支烟喘口气，接着奔回走。体力耗尽，最后的十几里路实在很难了。我仍然咬牙硬挺，铁生却一程不如一程，说话的气力都没了。

我一鼓作气把车拉到村口，好一阵儿没等到后面的车，明亮的月光下，却见铁生一步三晃地空手走来。“怎么啦，车呢？”我以为出了什么事。铁生的回答有气无力却很坚定：“不拉了。再拉一步非当下死这儿不可！”六十里都拉过来了，只剩下不到一里地的下坡路！——他大约走到了生命的极限。我说：“把这车先拉过河去怎么样？还行不行？”他

迟疑了一会儿，说：“走吧。”终于拚着最后一点气力，把重车拉过坑洼不平的河床。车轮刚出水便撂下，摇晃着奔我们孤独的土房去。竟然什么熟食也寻不到，也再无力量做点吃的。铁生摸了摸鸡窝，掏出一个蛋！忙慌慌煮了一个鸡蛋的蛋汤，热呼呼喝了，倒头便死过去。

一人一车，往返六十里山路，涉渡近十道冰河，二十个小时，这便是插队的尾声了。后来我去了煤矿，那是1974年。铁生还在大坪坚持了一段时间。只是不清楚我走后他一人孤孤的，又吃了些什么苦。



铁生前些年还冬泳，寄来些冰天雪地的照片叫人羡慕，一如青年时健壮、潇洒、旷达，怎么会说死就死了？我知道我不应该悲伤，因为《圣经》说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歇了地上的劳苦，得享安息了。但还是禁不住悲伤，

（约1973年，我去煤矿前与铁生的最后合影。左一甘铁生）总要痴痴地问：主啊，你把我的兄弟弄到哪儿去了？我有心缠住上帝哪怕跟他摔一跤，要他答应给我的弟兄以美好的祝福，答应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让我们在一个永恒的家园再次相聚。再没有泪水，再不分离。 ■

2018年7月19日

于华盛顿DC

原载《纵览中国》（Thursday, July 19, 2018）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96948>

【怀人】

我们的同学闻佳

鲍国芳、许晓鸣

许晓鸣：终于相见

2016年，我来到山城重庆，看望闻佳。

5月的重庆，早已是绿树成荫，趁着出差的机会，我邀请重庆市残联的同事，带着初三(4)班老师和同学们的嘱托，去看望一别48年的同学闻佳。

记忆中的闻佳梳着两条短辫，安静又拘谨。她曾任班里的生活委员，课间我们大家都在教室里嬉闹，只有她总是默默地擦黑板。写满粉笔字的黑板逐渐变得干净，粉笔末却落满在她的头发和衣服上。

“文化大革命”中同学们都各自星散，我们几个家境类似的同学一起在工厂串联。有一天，大家郑重其事地讨论一件事情：班上的闻佳希望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有个做过班干部的同学因为了解同学们的家庭情况表示反对，她的理由是闻佳跟我们出身不一样，大家都默认了她的理由。之后，闻佳参加了别的战斗队。

后来我们都陆续去插队。有一年，回北京听家里人说，你们班的闻佳被批斗了。后来又听说闻佳被判刑了。当我们再次聚首北京时说起闻佳，才知道她被关押了10年，虽然被释放却已精神失常。一直照顾她的舅舅年事已高，她回到重庆跟妈妈和姐弟一起生活了。

这件事情成了我的心病，我常常想，假如我们当初让她和我们在一起，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事情了吧？

但是历史从来不给我们重新选择的机会。

远远地望见闻佳和姐姐一起在小区的大门前等候，还是那淡淡的微笑，衣着干净整洁，但已是十足的重庆老太婆，旁边的姐姐虽然已是七十多岁，却顾盼生辉，美丽依旧。

闻佳拉着我的手，一口气说出好多同学的名字。记得贾群芳拉手风琴，问梁青是不是还跳舞？她带我参观她和妈妈住的房间，一起睡觉的大床，屋里东西挤得很满却很整洁。她带我看家人在房前开辟的小菜园：豆角和丝瓜秧苗爬满了藤架，牛皮菜伸开的大叶子铺了满地。每天她都会在菜地里流连，还会动手为家人做菜。只是姐姐补充说：锅都烧坏了好几口！



闻佳98岁高龄的妈妈不停地流泪，感谢大家对闻佳的惦念。望着依旧谈吐清晰的闻佳妈妈，我心里想的是：得有多坚韧的灵魂，才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磨难？！

姐姐说闻佳现在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但停药一天就会自言自语。由于闻佳户口在北京不属于重庆市管辖，精神病人的日常服用药要由舅舅定

(和闻佳妈妈（左）、闻佳（右）在家中)期从北京寄过来。家人也曾考虑过将闻佳的户口迁来重庆，但落户需要的条件是有工作或是有住房，闻佳却不具备。

重庆市残联的同事也介绍说，目前重庆市对残疾人的低保和相关补贴都低于北京，建议闻佳的户口还是留在北京比较合适；异地医保结算全国才开始试点，可能还需要等待几年。大家最担心的是将来家人无力照顾后闻佳的去处。

我介绍说，根据国家政策，闻佳属于民政部门托底负责的孤老，将来在北京应该有专门安置的福利院。家人们都认为现阶段跟家人在一起生活最有益于闻佳，将来如果有需要，会麻烦北京的同学们一起想办法。

中午我们一起走出小区，拐过好几个街口去吃饭，闻佳的两个弟弟专程从工作的地方赶过来相聚。大家坐在一起交谈，闻佳却自顾自地夹菜吃饭，这时才能感觉她确实还是有

些不一样。

回家的路上，闻佳和我手拉手同行，说起40岁那年，有人给她介绍对象，见过一面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她自嘲说，我这个刑满释放的人，身体还不好，怎么会有人看得上呢？

在小区的大门口依依作别后，汽车开出去好远了，我还听见小弟弟在大声喊：请老师和同学们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闻佳的！

回京后，我们班在北海故地重游。同学们急切、认真地听我介绍闻佳的情况，当我们一起品尝闻佳和家人让我从重庆捎来的特产小吃时，想必大家也和我一样，五味杂陈涌上心头。

我向大家介绍说，我已经咨询了相关部门，知道闻佳今后应当是区一级民政部门负责提供安置，户籍所在居委会负责联络和转介。大家说，将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初三(4)班会一起帮助闻佳。

闻佳本该跟我们一样，拥有自己的家庭和人生，但却被时代蹉跎了。所幸国家政策在不断完善，普惠的补贴也能够惠及闻佳；万幸母亲在有生之年力所能及地为她做了安排，姐弟们能够照顾，她在浓浓的亲情环绕中平静地度过余生。

折断的青春

那是47年前的1970年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委员会发布《通知》，公布了顾文选等55人的“罪行”，被列入这个《通知》的人，大部分被处以极刑。其中，排在第39位的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我们的同班同学闻佳，她的“罪行”是“自1968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闻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动标语，疯狂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帮、刘贼。”

最后闻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粉碎“四人帮”3年后的1979年，也就是闻佳被关押的第10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宣告闻佳无罪，予以

释放”。是她的舅舅闻林从河北省邢台监狱把她接出来，“当时见到的闻佳神色迷茫迟钝，灰白的头发蓬乱，苍白的皮肤附在骨骼上，形如纸人，瘦弱枯槁，惨不忍睹。”

关于闻佳，我们班的同学有这样的记忆：

闻佳是我们1966届初三(4)班的同学，她话不多，很文静，担任班里生活委员时，总是默默地去擦黑板、扫地。那时，初中的我们就是半大的孩子，上课听讲，下课玩闹，一有活动就兴高采烈的，她也不例外。

是文革改变了一切。虽然，我们班无论在初三年级还是全校都算是“老实”“幼稚”的，没有几个人冲锋在前，但那时

谁不想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啊，所以后来我们班也成立了好几个战斗队，闻佳参加的战斗队叫“天不怕”，牛立、钱德琳、贾群芳、李卫平、陈真瑞、孟晓青等都是这个战斗队的。其实，战斗队就那么回事，几个处得来的同学常在一起活动罢了，来不来都没关系。闻佳的舅舅（“天不怕”战斗队在天安门合影。后排右一是闻佳）

在大学工作，所以她还经常去参加大学生的活动。

我们班鲍国芳2010年曾写过那段时间班里的情况：

从1966年文革发动，到1968年分配，中间除了大串联、军训，我们各自参与一些学生组织……同学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少。在我和许多同学的记忆中，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班并没有发生过同学批斗老师，或者批斗同学的事件，而且也没有同学被称作什么“狗崽子”，当然也包括闻佳。这一点我想我们初三(4)班所有还健在的同学都可以作证。不过在极左思潮“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影响下，同学难免会自己对号入座，出身不好的自然有心理压力。



到了1968年年中，校园很松散了，战斗队也无所事事，大家开始各奔东西。有同学分到了工厂，有同学去了东北兵团，还有去内蒙古、山西插队的。留在学校没有走的同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来学校转一圈，谁也没有想到闻佳会出那么大的事。（鲍国芳《尊重历史真实是最起码的》，《记忆》总50期，2010年6月6日）



1967年12月，欢送四位同学开赴黑龙江兵团，我们班部分同学在学校门口的留影。
闻佳（前排左一）

往事不堪回首

1970年冬天。鲍国芳已分配到麻纺厂当工人，她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夜班，在厂大门口赫然贴着一张判决的布告。白纸黑字，前面几个名字被画了红叉，在被判刑的名单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闻佳！她竟然是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了20年，我震惊，大惑不解。闻佳是我的同学，在班里当过生活委员。说话细声慢语，总是面带微笑。文革之初，闻佳和我们都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后来才知道因为她父亲的问题，我

们去邢台军训时没有让她参加。几天后，还是下夜班，经过风吹雨打，那张布告已经垂落下来，趁着没人，我偷偷把它扯下来，之后寄给在内蒙插队的同学。

班里不少同学是上山下乡回北京后才陆续听说闻佳的事情。几十年后有了网络，看到一些披露闻佳挨斗的文章，时间都是在1970年2月发布的闻佳被点名的《布告》之后。

同校同届三班的许容，2008年在博客里回忆了闻佳在官园体育场被批斗的情况：

批斗闻佳的大会我是参加了的，那时我在服装厂，属西城。具体时间可能是1970年冬季，会场在官园体育场，我记得站在台上的闻佳穿一身蓝棉袄，脸色惨白惨白的。当时批斗发言的是学校老师某某，特大声音喊。那天我亲耳听见宣判20年，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听了半天也没听出闻佳有什么“罪行”。台下观众大多富有同情心，工人师傅虽没文化，但知道闻佳是我的同学，就对我说：“你们这个同学判20年真重，从此她就要过非人的生活，弄不好就发配到青海那样的荒地去……”三十多年过去，还能依稀想起那天宣判大会的情景。确实不堪回首啊！

北岛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讲的都是四中文革中的事，其中也提到一句在四中开过闻佳的批斗会，那天四中学生赵京兴也被同台批斗。一个1970年还在学校的学生，最近看到有关闻佳的文章，跟帖回忆了押送闻佳到女附中挨批斗的情况：

1970年春夏之交，一天，我们几个人在操场上玩，外面有人喊“闻佳来了”！跑出校门一看，一伙警察押着一个年轻女子沿二龙路从南向北走过来，十几岁的女学生，个子不高，给人以弱不禁风的感觉。头发凌乱，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闻佳”的牌子，由于带着手铐脚镣，走起路来失去平衡，警察推一下，跌跌撞撞走几步，原来这是警察（也许就是军人，那时都是绿军装，分不清，公安局也被军管了）押着闻佳回女附中批斗。让我记忆深刻的是，闻佳始终昂着头一脸不屑的样子，按当时的说法，应该属于“反革命气焰嚣

张”这或许是押回女附中要痛加批斗的主要原因。



，1970年闻佳（台上左侧挂牌者）在四中斗争会上被批斗，中间挂牌者为四中学生赵京兴

心中永远的痛

2007年11月，我们班贾群芳写过一篇博文《闻佳，我心中永远的痛》：

一天晚上，我到母亲家，说起我们班聚会的事，没想到我弟弟还记得牛立和闻佳。

弟弟回忆：“我最后一次见到闻佳是在0号楼旁，她见到我，摸着我的头说，你快快长大吧。后来就听说她被抓起来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

我弟弟那时大约十岁，现在已是五十来岁的人，回忆起40年前事情，还对那些细节记忆犹新，那是因为闻佳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接着，我又大概说了说闻佳的现状，我们感

叹，那场运动毁了多少人、多少家庭！从始至终，我的鼻子都是酸酸的。到了楼下，当我骑上车在返家途中，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弄湿了我的镜片，在寒风中凝结成几片雾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的眼前浮现出梳着两个小辫、脸略显苍白的闻佳，她那时和我的接触也许是比较多的，到我家也来过几次。我记得她总是很佩服朱新，说她当班委认真负责，又是团员，而我俩都不是，我们要向她学习，多做好事，关心集体，向着团员的目标迈进。还有一件小事记忆犹新，她经常拿着我写的字欣赏揣摩，说多好多好，我说我的字才不算好呢，我是受了波儿的影响才写成这样。初一时我和波儿曾是同桌，当我还写方块字时，波儿的字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同桌，就潜移默化地受了熏陶，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方块字改成了“大人字”。闻佳对许多事都是那么认真，那么执着，从争取入团到练习写字，总是不甘落后，不满足于现状，要进步。要当“好人”，是她学生时期始终的信念。

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好学上进、单纯善良的小姑娘，竟然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成为“现行反革命”，因不堪忍受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曾经到厕所“自绝于人民”。自杀未遂后，又听说北京开了闻佳的批斗大会，那时她已经“升格”为政治犯。我早就去插队了，后来的事都是听说的，直到现在，要不是老鲍（鲍国芳）提供信息，说她在四川老家与老母亲一起生活，神经不太正常，对她的事我是一无所知。

我自责，连我的小弟弟，当时年仅10岁的孩子都能记得最后一次与闻佳见面的情景，我怎么就不记得最后一次见闻佳是哪年哪月呢？我无奈，在那个年代，别说是一个小小中学生了，那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各界知名人士都惨遭迫害甚至死于非命，谁能拯救他们？谁能保护他们？

闻佳是贾群芳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我们全班全校同学心中永远的痛，包括我们的班主任金元老师。2007年10月，金老师在给我们班朱新的信里写道“看了你们的照片就想起了她（闻佳）”，还说：“牛立1971年回校时，我们坐在宿舍楼前谈论各种事情，包括闻

佳的事情至今历历在目。前些年闻佳舅舅来过我家，希望学校给她安排工作，我只是学校一名教员，又加上她的事情不是咱们学校处理的，找了书记后，情况怎样就不得而知了。”

采访闻佳的舅舅闻林

几十年过去，闻佳到底怎么样了？她还好吗？这些在我们心里挥之不去。经多方打听，鲍国芳终于找到了闻佳的舅舅闻林先生。2003年，老鲍不但采访了闻林，还写成文字记录下来，后来又放到了博客上。鲍国芳的博文是这样记录的：

闻佳舅舅说：是李天义（师大女附中革委会成员）告诉我们说，闻佳是在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厕所里绝食自杀（1968年底）的，不知有几天。有人听到呻吟的声音，才发现她快要不行了，那时她已经奄奄一息，很快就被送到医院才被抢救过来。李天义说这孩子怪可怜的，让家里接回去吧。我们正要接走闻佳时，有一个声称是政工组的身强力壮的女人来了，大概有三四十岁，她说：不行，这个人你们不能接走，她有问题要审查。看来李天义说了不算，我只好和闻佳的哥哥去找革委会的主任。革委会的主任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年轻人，他也表示不能接走。就这样，学校不放人，我们没有接回闻佳。

那时天气都已经冷了，学校通知给她送衣服，这是我第二次见她，那是在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门口有红卫兵看守，房子中间有一张床，靠床边有一张桌子，在这里她被隔离审查，让她写交待材料。

第三次见她，是过了很长时间，已经不在学校，是西城公检法军管会，在一个胡同里，从大门进去一边有一个耳房。有一个粗壮的大汉身着棉大衣。当时是让我送卫生纸、衣物等。正要进去时碰到闻佳出来，大汉马上把我挡住，让我回避，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切，她戴着手铐脚镣被人又推又打押上了一辆大卡车，这是揪去作为阶级敌人当典型轮番游斗去了，那时闻佳仅仅18岁。这后来我就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2010年，鲍国芳在网刊《记忆》上写文章说：

关于闻佳的蒙难入狱，她舅舅后来从西城区法院苗清仲厅长（苗在后来重新审理闻佳的案件时非常同情闻佳）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原来闻佳是因为对上山下乡不理解，说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就被人抓住说她从思想上不愿意上山下乡，就是反对上山下乡，反对上山下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上纲上线，批判她（这个批判应该是在我班大部分同学都上山下乡、分配后发生的，也就是1968年，而不是1966年夏）。她舅舅不知道她在学校挨批，她本来思想上压力就很大，回到家里舅舅、舅妈也劝她还是要上山下乡，就这样两头挤她，她觉得没路可走，就在学校自杀，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

她舅舅还说：她的遭遇和她父亲的悲惨身世有关。解放初，闻佳父亲在当时只是一个家庭出身地主的学生，开始在机场当过文书，后来在粮店工作，本人什么问题也没有。在乡下上学时同学里有矛盾，在肃反时有人陷害他，把他从工作单位抓回去，在枪毙肃反对象时把他拉去陪绑，结果把他打死。既然死了就把他当成恶霸地主了。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给他平反。但是这之前家里一直背着这个黑锅。闻佳的母亲实在太苦了，当时丈夫冤死，自己又成了反革命家属，她独自带着儿女们，生活非常困难。找不到工作，后来向有关方面反映，才到一所中学工作。为了帮助她，闻佳的舅舅就把闻佳和她的哥哥一起接到北京上学，就住在闻佳舅舅家。闻佳的母亲后来改嫁，不久又离婚。

在后来西城法院宣判她无罪释放的文件里说：“本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闻佳及其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闻佳精神失常。将其在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认定为反革命罪而判处重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即使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文革中所谓的反动言行，在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也不能成立，更何况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现在看当时对闻佳判决的错误是双重的。

2016年，同学们在微信里继续关注闻佳，这时离鲍国芳采访闻佳舅舅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曾经留下的电话已无人接听。但鲍国芳没有罢休，通过外语学院离休办得到闻佳舅舅的新电话，联系后得知闻佳的老妈妈已经是98岁高龄。当鲍国芳在微信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时，群里就像开了锅。周晓红首先提出我们要为闻佳做点什么，同学纷纷响应。这时，有人再次提出：闻佳属冤案，可不可以申请政府赔偿？在残联工作的许晓鸣则提出，目前国家政策对重症精神病患者有补贴，咱们应该帮助闻佳争取。

当我们把这些想法告诉闻佳的舅舅后，老人最担心的是他百年后需在北京办理的事没人管了，而且对闻佳究竟是继续在重庆养老还是回到北京有些犹豫不定。为了帮助闻佳舅舅了解目前国家的有关政策，我们班几个同学一起去房山区闻佳的舅舅家看望。几天后，我们接到闻佳姐姐的重庆来电并与闻佳通了电话。

四十多年了，能够亲耳听闻佳说话，让同学们兴奋不已，“我们没有忘记你——祝闻佳快乐健康”的捐款活动从3月18日至3月22日，仅仅5天光景，总计捐款16600元。当时我们仅在微信群内倡议，而在群里的梁青、还没入群的金元老师，还有群里的一班的郑放与苏君也都积极参与，身在大洋彼岸的几位同学通过网传或委托国内家人代转，捐款从国内外、班内外纷纷到账。48年的同窗情，尽情流淌！

16600元带着同学们的爱心和祝福，汇给了闻佳。在闻佳姐姐为她代笔的感谢信中说：“感谢老师和同学们慷慨解囊对我的爱心捐助！老师的关爱、同窗情谊的真挚，让我又回到了昔日初三（4）班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

闻佳的遭遇，是同学们心里永远无法抹去的痛。值得欣慰的是，当年各派同学都能和谐相处，不仅踊跃为卞校长制作塑像捐款，独立思考，反思文革也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为了闻佳晚年安康，同学们慷慨解囊虽力之微薄，也让在文革中饱受磨难的闻佳感受到人间的温情。 ■

原载“岁月女附中丛书”之《口述春秋》（王本中主编），2017年自印。

【书评】

知青们的贡献与收获

——读冯同庆的长篇小说《敕勒川年华》

马昌海

《敕勒川年华》中所描绘的，是北京最好的男中和女中学生在农村的所作所为。在这些重点中学的孩子们身上，17年教育的熏陶和印记，比同龄人更明显，更深入。他们怀着建设新农村的“豪情壮志”来土默特插队，一心要做一些事情，如通电、育种、育林、饲养、行医、教书，当会计、打机井，直接参与生产队的管理工作等等。

在从事艰苦劳作同时，知青们也对国情、民情和人民公社体制，有了真切深入的认识。知青在下乡以前所接受的是社会主义“尽善尽美”的教育，教育者始终没有将社会真实的另一面如实地披露。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封闭、肮脏和愚昧，对知青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知青们到了农村，才了解了中国的实情。这些知青从小所受的教育是：农民都是爱集体、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的。我们被送到农村来，就是要通过艰苦劳动的磨练，接受广大农民对我们的教育和改造。他们在一开始还不能理解：在人民公社大锅饭的体制下，农民在出工干活时，普遍偷懒现象的必然性：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好好干的吃亏，不好好干反而占便宜，谁还好好干？于是大家都出工不出力，受穷就受穷，又不是我一个穷。其实在那个年代的体制下，很多城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

一些知青到农村后才了解到土地改革、1956年合作化、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年大饥荒及而后推行“三自一包”措施的真实情况，看清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在继续阅读经典著作和大量“禁书”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文革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反思和探索，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从而成为那一代人思想上的一批先驱者。建国后17年教育使这一代人最缺少的批判怀疑和独

立思索的精神由此而产生，其中有不少人成长为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作家张抗抗在对法国学者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一书的评述中指出，中国知青下乡运动提供的独特历史经验，为魅力威权的局限性做出了极好的诠释。而历史的吊诡与反讽在于，恰恰是上山下乡运动，促使知青开始自觉思考自身与国家的命运。正如书中引述的学者李银河教授的原话：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¹

潘鸣啸指出：就像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事件那样，失败本身会带来正面的后果。这场运动也不例外……它提出的众多重大问题迫使毛泽东的继承者进行改革。毛泽东激进与极端的政策，在各个领域里都加速了历史的进程，不过是朝着毛所期望的相反方向进行的。² 在这方面毛泽东失败了，他想要改造这一代人，结果却培育了一批讲求实事求是、注重民主法治和人道的人，而不是他所希望的革命接班人。

敕勒川的知青们初来乍到，就迎头撞上了农民“瞒产私分”的普遍现象（见本书第11章、第33、34章的描述）。对这个事情，毛主席也表示了理解：“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³书中说“瞒产私分”让我们懂得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知青们当时虽然还不能完全接受“瞒产私分”的这种违反党和国家政策的做法，但在现实生活面前，他们还是做了妥协。他们不知道：这其实是“三年大饥荒”惨祸留下的产物，中国农民实在是饿怕了。这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像当时流传的前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说过的一句生动形象的话：“家雀儿落在谷堆上，饿死了？怨谁嘛？”。历史学家高王凌教授曾在全国多个地方调查过人民公社时代的“瞒产私分”现象，他称之为农民的“反行为”，可以理解为农民对人民公社某种程度的“抵抗”。更大程度上，这只是农民在集体化体制下对缺粮恐惧的一种自卫反应。

那么，为什么艰苦的劳作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状况呢？知青们通过亲身的农业劳动实

¹ 李银河：《我的人生第一课》，《北京文学》1998年第6期，第102—103页。

²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418页。

³ 《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22页。

践，与农民的交往和探讨，逐渐明白了，根子就在于荒唐的人民公社体制。

同样的一块土地，在一个种田能手的经营之下，预期能有最大限量的产出；如果细分给了几个劳动技能不同、生产经营经验各有差异的农户，包括缺乏劳动力的孤寡老人、寡妇以及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都分到了一份。同样这块土地的产出与过去相比肯定会大大降低。土地与劳动力之间的最佳配置，在土改前是由市场调节自发完成的，现在被人为强力打破，功效自然大大下降。

初到敕勒川，知青们就听当地干部和老乡讲了不能违背天意，随意变更生产关系的道理。人为干预搞集体化会造成人祸。要遵从自然规律：天种天熟的生态农牧业。所谓“天种（上天恩赐）、王教（汉王教诲）、人居（人事有约）”；“命养、自养、共养、契养”。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什么，怎么种，都由自己来决定，不赞成土地收归国有，搞农业集体化。

至于敕勒川的农民为什么赞成搞互助组（即页137提到的传统“锄社”）？中国农村一直有互助的传统，这是对家庭经营的必要补充，不是农业经营的主体行为，更扯不到社会主义性质上。在中国农村极其贫困落后、缺乏先进农业机械的状态和条件下，简单协作（互助合作）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绝不能将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绝对化。

互助原本只是传统乡村社会中社区互助或慈善性的活动，是零星发生的；而合作主要是在农户之间自发出现的，主要是犁杖、水车、牛马、驴、大车之类等大型农具和水利设施的合作，这是一种短期的一次性合约，是外部的、无须组织化的合作关系。这是由乡村传统乡规民约所明确的，不是合并或重组。比如春耕时，有犁的农户与无犁农户的合作，春耕之后就没有了。无须有个组织始终存在于斯。同样，到收获时节也有互助，也是季节一过就停止了。如果有常设组织，那就要发生费用即组织成本。但除非是组织成本低于组织化收益，常设组织才有存在的可能。

实践证明，家庭经营和社会经营的结合是农业的最佳机制。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

都是家庭经营。不少国家的农民生活都不错（当然也有高科技的应用，如飞机播种和播洒农药除草、除虫，施肥；搞生态农业以及先进的滴灌技术；工业反哺农业，政府给予高额补贴的因素），相反，凡是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国家，农业都不成功。

当然，在自给自足性的社会中，依靠家庭经营农业就能维持并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社会中，农业只依靠家庭经营是不够的，需要有社会的支持。农业的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需要有农用工业的支持；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需要有食品工业和商业的支持；农业也需要金融、科技、教育、信息、运输等部门的支持。个体农民的力量有限，需要有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但是所有各种社会支持，都必须以农业的家庭经营为基础。

家庭经营和社会经营的结合是农业的最佳经营结构，这是被世界各国农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所证明的事实。

《敕勒川年华》还谈到了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使用权的分置问题，这正是农村改革的前提和起点。文革前1965年就到河套九原下乡的老知青们显然更了解民情和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他们更务实，也就取得了更好的成绩：这是他们实行承包制，搞小包干，搞副业多种经营，实行良性循环的结果（见本书页285）。

书中还谈到了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生产力上千年的管理机制——“乡村自治”。义学、义堂、义地，具有教育、自卫、救济灾荒、抚恤孤寡老弱和祭祀的功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只能借助和大家族平分权力的合作模式，有限地介入乡土社会。也正是这种制度安排，使中国传统农村里贫富不均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民间宗族承担着扶济族众、化解纠纷和教化子弟的责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也延缓了国家的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程度。

书中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变，就是从回归常识开始的。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违背常识就会造成人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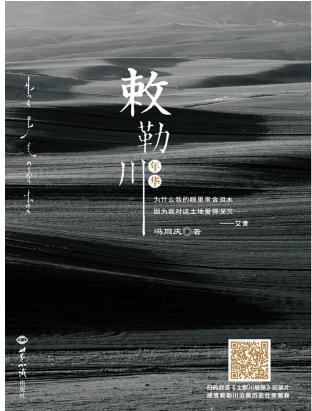
如今，在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的制度能量已经释放出来以后，土地经营权可流传后，

如何进行集约化、现代化经营，是一个新的课题。■

【书讯】

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敕勒川年华》问世

刘豫徽



2018年8月，世界知识出版社打造的青春文学《敕勒川年华》，正式出版发行。

敕勒川，是享誉天下的《敕勒歌》的故乡，这里魏晋称敕勒川，隋唐称白道川，辽金元称丰州滩，明清时蒙古族土默特部入驻，又称土默川，而传之久远、声名远播的则是敕勒川。

上个世纪60年代，京城有一千多名中学生，来到这里插队，大青山下，黄河套里，野川之上，淳朴的蒙汉老乡，以广阔的胸怀、仁慈的心肠、豁达的情怀，收留并接纳了他们，多数人在这里生活了三五年，还有人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一些人在这里安了家、落了户，而年至终老。之后，他们不断回首，上个世纪90年代，有人以《草原启示录》追记那里的过往，有人以《青春方程式》记述女生的经历，进入新世纪，旗政协两次组织撰写回忆，近百人的忆旧收集到《土默特左旗文史资料》专辑中，陆陆续续在各种网络媒体上。

《敕勒川年华》讲述了作者亲历的上山下乡的故事：京城最有名的男中、女中，一群男孩儿女孩儿，离开京城，来到苍茫的敕勒川，在非常年代，经历了不寻常的生活，感情纠缠，乡土情愫，蒙汉礼赞，京蒙长歌……，走乡走城，跨出国门，走向辽阔。

《敕勒川年华》的作者，来自北京有名的男子中学——北京四中，胡同里的孩子，最为“好乖乖”那种，五十年后回忆、反思和叙说，与一群男孩儿，还有一群女孩儿，各色



孩子们，如何告别京城，来到天苍苍、野茫茫的敕勒川，度过别样的青春年华，在边地宽乡感受淳厚乡情，在非常年代灵魂获得救赎，春种秋收、生存纠葛、感情纠缠、流汗流血、母校惦念、再进校园、重启人生……，这里的岩岫原野，滋养了他们浓厚的乡土情怀，引领他们走向更加辽阔的生命历程，留下的是一段深厚的生活叙事，一首汉蒙礼赞，一曲京蒙长歌……

作者中学母校的师长、一起插队的插友，向读者推荐《敕勒川年华》。

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铁岭：这是一首铭刻在京城游子、敕勒少年、广大知青心中的青春之歌。真实、生动、深情，引人思索、感悟，激励勤奋进取！

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敕勒川年华》告诉我们，生活是如何造就了人的品格、人的精神、人的信念和人的理想。不论怎样的青春岁月，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蒋效愚：敕勒川上的北京知青——难忘人生青春岁月，记叙历史时代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一百个知青写，就有一百个不重样的知青故事。敕勒川年华，我们的青春年华！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 钱江：敕勒川，阴山下，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也应该是动人故事和诗的故乡。 ■

【资料】

资料·内容·理论方法

——中国知青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易海涛

“知青”，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是一代人的代名词。目前，关于“知青”身份的认定没有太大分歧，大抵认为是文革期间，尤其指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最高指示发出后，

到农村、国营（含兵团）农场参加劳动的城市中小学生。但是，文革之前也一直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劳动，因此，关于“知青”身份的界定又充满争议¹。就此，定宜庄认为知青上山下应以1953年国家为处理中小学生升学问题为起点。²这涉及到知青上山下乡的缘起，也有不少成果就此展开讨论。尽管争议存在，但这并未影响研究的整体推进。自1970年代至今，知青史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目前，已有好几篇知青史研究综述文章³，甚至还有相关学位论文做过研究⁴。应该说，这些学术综述的确对已有研究有不错的回顾和总结，并且还有相关评价和思考，为进一步开展知青史研究帮助颇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或将国内外分开讨论，不利于对知青史研究的整体推进；或较少从问题入手对已有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尤其是未能对近年来关于知青史研究出现的新局面及时进行梳理。为此，本文避轻就重，希望将国内外（主要以中国大陆学界知青史的成果为主，兼顾少量英文成果）知青史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既对学术史有一个整体性的梳理，同时也希望对新近出现的情况做简单介绍，以期总结经验，更好地推进知青史研究。

一 知青史研究概况

1. 1970~1980年代：起步阶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展后不久，从中央到地方编写了不少总结成功典型、宣扬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建设的著作（包括一般读物、资料汇编等）⁵，这些图书不断出版，直到上山下

¹ 就笔者接触到的材料和个人，有人坚定认为“知青”就应指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中小学生，也有人认为自1950年代开始回乡、下乡的中小学生也属“知青”。

² 详见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³ 刘小萌：《西方学者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青年研究》1994年第3期；刘小萌：《中国学者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青年研究》1994年第5期；徐春夏：《90年代国内关于“知青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张曙：《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邱新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综述》，《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

⁴ 王春娥：《近三十年国内知青史研究述评》，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硕士，2010年。

⁵ 山东人民出版社：《活跃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的知识青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培养为社会主义事业忠诚服务的劳动知识青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大有出息 大有作为：记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事迹》，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62年。这些著作数量多，现分布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尽管这些图书并非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它们在总结这些经验、宣传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时就已经赋予这些资料的时代特性，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对于这些图书的

乡运动结束。这些图书既来源于上山下乡的具体经验，同时也在各地再次进行宣传，进一步指导上山下乡的开展。以这些图书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材料流散香港，成为当时海外了解这场运动的重要材料。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逃港知青的口述，一些国外学者便开始研究上山下乡。

早在1971年，彼时上山下乡正如火如荼进行，美国学者John Gardner就已经开始讨论知青上山下乡这一话题。¹随后，Pi-chao Chen, Gordon White, Hong Yung Lee等人都对此问题有所研究。1977年，伯恩斯坦（Thomas Bernstein）的著作问世，这是英语学界第一本专门研究知青问题的著作。²1971年夏，伯恩斯坦就开始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1972～1973年他在香港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一方面在香港搜集文字资料，另一方面对逃港知青展开访谈，做出了当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为全面的研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向尾声，西方学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更为突出。1979年，Anne McLaren对上海知青回城所张贴的大字报有过分析³，随后，又有Stanley Rosen对广州的个案研究⁴。1985年，陈佩华（Anita Chan）对红卫兵一代的研究著作出版，这不但有助于了解知青的成长环境，同时还有不少内容直接提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⁵

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因工作需要，内部编印了《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⁶，该资料来源于各地统计材料，是目前所知最早、最全面统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资料集成。该书对各地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知青受迫害案件、经费和住房等资料都有详细统计，成为后来研究知青史的必备资料。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改革开放

种类、特点及其意义拟另行讨论，故不在此展开。

¹ John Gardner, *Educated youth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ies*, John Wilson Lewis Edit,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35–286.

² Thomas P.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³ Anne McLaren ,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 (Jul., 1979), pp. 1–20.

⁴ Stanley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1.

⁵ Anita Chan,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⁶ 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1981年3月，内部出版。

持续推进，大陆学界也加快了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一开始，对知青的讨论多出现于当时的文学作品，随之才慢慢有学术性的论述。1986年，崔武年、阎淮的《谈谈“老三届”》¹发表，稍晚，史镜、李明启、邢宝玉三人合撰的《赴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历史与现状调查》²发表。这两篇文章标志大陆学界开启了对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不过，其落脚点还在于社会现实问题，而非从历史视角展开讨论。次年，张化从历史学入手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讨论，她对文革前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进行系统论述，并提出了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问题。³

2. 1990~1998年：快速发展阶段

1990年代知青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是知青史研究的高涨时期。1990年，《辉煌的青春梦——知青生活纪实》⁴、《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⁵出版，前者以纪实文学体裁再现了知青生活，后者则从编年纪事的角度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所展现。柳建辉的论文对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了总体性评价。⁶1991年，王一晶从劳动就业的角度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了讨论，认为就业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⁷黄金平通过对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的研究，认为应该把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呼吁作为上山下乡的开始，同时又提出1956年的农业发展纲要是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他对文革前上山下乡持肯定态度。⁸柳建辉则认为，上山下乡的直接原因是毕业生就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文革中对知识分子“左”的错误估计，导致在主观上认为要进行一场教育革命，培养接班人；与工农结合则是思想原因。⁹显然，对知青史的讨论进入了更为专门的轨道。

¹ 崔武年、阎淮：《谈谈“老三届”》，《青年研究》1986年第4期。

² 史镜、李明启、邢宝玉：《赴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历史与现状调查》，《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6期。

³ 张化：《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谭宗级、郑谦：《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⁴ 黄尧编著：《辉煌的青春梦——知青生活纪实》，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

⁵ 郑潘主编：《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1919~1979）》，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

⁶ 柳建辉：《试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青年研究》1990年第4期。

⁷ 王一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劳动就业》，《青年研究》1991年第11期。

⁸ 黄金平：《文革前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回顾》，《当代青年研究》1991年Z1期。

⁹ 柳建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原因初探》，《中国青年研究》1991年第4期。

从1992年开始，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著作或论文出现，知青问题的讨论热度持续增加。当年就出版了《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¹、《蹉跎与崛起》²、《知青档案：1962～1979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³等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上山下乡的亲历者，对上山下乡体悟颇深，因此能以纪实文学的笔法对这场运动进行全景式的重塑。纪实文学既不同于小说也不同于学术研究，但至少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当时的场景，丰富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

在研究者的不断推动下，知青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1993年，《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⁴、《中国知青梦》⁵出版，前者对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总括性的研究，后者则以纪实文学的方式，从云南知识青年返城写起，进而写到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此外，还有作品以小说的形式对陕北北京知青进行描述⁶，以及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回沪知青子女的心态进行探究⁷。由此，也不难发现知青史研究的全国性与地方性双线进行。与此同时，伯恩斯坦的著作也被译成中文，从而有助于中外学界就这一话题更好地对话。⁸显然，知青史研究已沿着国内外共同研究与对话、地方与全国层面研究共同进行、历史学科和其他学科共同研究这一话题的交织局面进行。正是在这种趋势之下，关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研究出现⁹，同时也有对知青婚姻¹⁰以及返城动因问题¹¹的研究。

为更好推进知青史研究，就此话题与国外学者展开对话。1994年，李丹慧、李向前主编的《理想与现实：外国学者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书出版，该书对国外学者就此

¹ 火木：《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

² 何世平：《蹉跎与崛起》，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

³ 杨智云：《知青档案：1962～1979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

⁴ 杜鸿林：《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广州：海天出版社，1993年。

⁵ 邓贤：《中国知青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⁶ 白描：《陕北：北京知青情爱录》，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

⁷ 董敏志：《回沪知青子女心态及成因试探》，《当代青年研究》1993年第6期。

⁸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李枫等译，夏潮校，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⁹ 何岚、史为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

¹⁰ 刘小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青年研究》1994年第8期。

¹¹ 潘一：《知识青年大返城风潮动因探寻》，《青年研究》1994年第3期。

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总体性的介绍。¹如果说这本书为研究知青史提供了一种国外视角的话，那1995年问世的《中国知青事典》²则是中文学界百科全书式的“知青”著作。除总括性的研究外，知青个体记忆视角下的上山下乡也逐渐被重视。刘中陆对五十名北京女知青的自述进行整理、汇编，从而探求到个体记忆中的丰富图景³。

当知青史研究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国内学界就知青相关问题出现了争议，首先就是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期的讨论⁴。关于分期的讨论其实是对知青史内容的实质性分歧，这还涉及到上山下乡的性质、知青与劳动就业等的关系诸问题。显然，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无疑有助于拓展对知青史的进一步研究。此外，知青史的具体问题仍旧在不断被讨论，刘小萌的《“血统论”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⁵就出身与知青上山下乡展开了论述，刘小平的《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⁶则把安徽的上山下乡作为讨论的具体对象，对上山下乡的缘起、人数、安置都有具体分析。

1996年，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⁷、《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⁸出版，成为研究知青史的重要资料性参考书。两本书都以时间线索展开，《始末》披露了许多重要的文件材料，又有专题性的叙述，《大事记》则以编年的方式对每一年的大事进行了细致梳理。与此同时，知青子女这一现实问题也得到了更多讨论⁹，还有《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1968年秋～1971年秋）》¹⁰、《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¹¹的出现。显然，关于知青史的研究越来越多元，同时也涉及到诸

¹ 李丹慧、李向前主编《理想与现实：外国学者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² 刘小萌、定宜庄、史卫民等编著：《中国知青事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³ 刘中陆：《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⁴ 方奕：《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第4期；柳建辉：《也谈中国知青史的历史分期》，《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⁵ 刘小萌：《“血统论”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青年研究》1995年第2期。

⁶ 刘小平：《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

⁷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

⁸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

⁹ 朱立红：《回沪知青子女犯罪问题的思索》，《青少年犯罪问题》1996年第2期；郭栋、金大陆、杨长征：《城市苦娃：关于京津沪知青“回城子女”问题的对话》，《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6期。

¹⁰ 杨健：《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1968年秋～1971年秋）》，《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2期。

¹¹ 何岚、史为民：《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多现实问题的研究。

1998年是毛泽东最高指示发出30周年，因此当年出现了大量关于知青的研究成果。其中，定宜庄所著《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¹、刘小萌所著《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²成为众多成果中的典型代表。两书作者都是知青出身，既有自身的深刻体会，同时又能综合利用各种资料进行研究，在书中既有总体论述又不乏具体分析。两书作者的初衷是将文革前后的知青史贯通，故《初澜》从1953年国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写起，截止1968年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中间包括青年垦荒队、1957年未能升学中小学生下乡生产、到边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精简计划，等等，重点讨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大潮》从1966年写到1980年，先对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有所回顾，随后分上中下三篇对文革时期知青史进行讨论，层层剥笋地对这段历史展开述论，包括动员、安置，运动的困境与解决、婚姻、案件以及最后回城，等等。尽管两书的侧重时间段不一样，但彼此仍有所呼应。此外，还有《老知青》³、《中国知青总纪实》⁴、《老知青写真》⁵、《上山下乡——一场决定3000万中国人命运的运动之谜》⁶等纪实类作品。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多数本身就是知青，或者对知青有过深入调查，因此从宏观层面知青问题进行再现与反思。《中国知青诗抄》⁷虽是知青诗歌的合集，但也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当时的上山下乡情况；《白山黑水：一个上海知青的尘封日记》⁸则以日记的形式展现了一个上海知青在吉林延边插队的生活；《中国知青情恋报告》⁹讨论了知青婚姻恋爱情况。老三届也成为此时专门讨论的一大话题，并有相关成果进行专门探讨¹⁰。知青子女问题这一

¹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²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³ 成江编著：《老知青》，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年。

⁴ 吴洵、妮娜等编：《中国知青总纪实》，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

⁵ 裴雨林：《老知青写真》，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

⁶ 王鸣剑：《上山下乡——一场决定3000万中国人命运的运动之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⁷ 郝海彦：《中国知青诗抄》，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⁸ 范文发：《白山黑水：一个上海知青的尘封日记》，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

⁹ 章德宁：《中国知青情恋报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¹⁰ 详见金大陆：《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金大陆：《“老三届”与“婴儿潮”的代际特征》，《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12期；刘小萌：《“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的缘起》，《文史

老话题此时也得到了新的关注，尤其是上海知青子女进入大学后的心理状态¹。当年还有一篇关于知青的硕士论文²，尽管论文并非历史学论文，但这说明知青问题在当时讨论的热烈程度，这也预示知青史、知青问题研究是之后的重要研究方向。

3. 1999~2008年：全面推进阶

1998年算是知青史研究的一个分水岭。此后，知青史研究放缓，直到2008年再次出现大批量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关于全国性的宏观论述不多见，关于专题性、地方知青史的讨论则不断增加，同时还有大量回忆录、资料汇编的出现。

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仍旧得到讨论³，同时也有对国家领导人与这一时段知青上山下乡的论述⁴。其实，关于国家领导人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就应该是讨论的重要内容，而且诸多成果中往往也会涉及到这一点，但苦于资料不足和研究视角单一，故这一方面的成果并不多见⁵。另外，地方知青史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其中，新疆⁶、云南⁷、内蒙古⁸等地知青史成果较为突出，无一例外，这些地方曾经都安置过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跨省知青。同样，作为知青输出地的上海⁹、北京¹⁰等地也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此外，一些省、市、县自行安置知青的地方也编写了大量作品，主要是以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为

精华》1998年第9期。

¹ 陆湘霖、张忠怡、龚怡：《大学生研究不可忽视的群体——进入上海高校的知青子女情况分析》，《上海高教研究》1998年第11期。

² 马孟珂：《试论毛泽东知识青年再教育思想和实践》，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硕士，1998年。

³ 崔禄春：《论文革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4期。

⁴ 张曙：《刘少奇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党史研究资料》2000年第8期。

⁵ 胡文超：《毛泽东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思想根源探析》，河南大学，中共党史，硕士，2007年；张曙：《邓小平与知青问题的解决》，《党的文献》2003年第6期；甚至到最近，也只能零星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张曙：《周恩来与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

⁶ 姚勇：《上海知青在新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开全主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第12册）·支边知识青年专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青青主编：《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知青生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

⁷ 周公正：《勐龙印迹：上海知青在西双版纳》，2001年。

⁸ 邢野主编：《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⁹ 朱政惠、金光耀主编：《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¹⁰ 赵燕军主编：《天山脚下的北京知青：1965届北京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北京：北京北人羽新胶印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

主¹。总体而言，这些资料汇编性质的著作反思性、批判性的思考并不多，大多平铺直叙，难免千篇一律、缺乏新意，不过，透过这些资料也能丰富大家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

其实，这期间也有不少学位论文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展开研究，或从一场失败的社会试验来看待这场运动²，或将文革前后的两段知青史对比研究³，或专门就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论述⁴。针对自己的专题，这些论文都对知青史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讨论，但囿于档案资料限制、理论视角缺乏等方面的原因，尤其缺乏对口述访谈的充分利用，因此应该深入讨论的地方也有限。与此同时，国外也出现了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总体性论述。潘以红作为一名曾经下乡的知青，一方面广泛搜集资料，一方面从自身经验出发，对上山下乡展开讨论。⁵法国学者潘鸣啸 2004 年也在法国出版了关于知青上下下乡运动的著作⁶，这本书的资料搜集得比较全面，而且还在各地对知青进行了访谈，从而对上山下乡的动机、过程、终结以及知青下乡后的种种情况都有讨论，从而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了重新评价。⁷

此时仍有不少论文讨论知青上山下乡的原因、动机，但难有较大突破。另一方面，有学者从知青个体出发，以口述访谈的方式切入，讨论知青史当中的具体问题，可谓洞见迭出。2004 年，《中国知青口述史》⁸出版。实际上，作者刘小萌 2002 年就写出了这本书，

¹ 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长沙，2004 年；张明志主编：《西昌文史（第十七辑）·知识青年山上下乡专辑》，西昌，2004 年。张明志主编：《西昌文史（第十八辑）·知识青年山上下乡专辑》，西昌，2005 年；林明主编：《南宁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沧桑岁月（南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专辑）》，南宁，2004 年；吴应和主编：《营山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蹉跎岁月——营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营山，2005 年；李盛文主编：《南充市文史资料（第十四辑）·我们那个年代——南充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南充，2005 年；董平主编：《知青岁月录：腾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专辑》，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陇原》，兰州，2006 年。

² 张曙：《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博士，2001 年；江京晖：《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浅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外交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2002 年。

³ 方英：《文革前与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硕士，2007 年。

⁴ 孙杰：《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武汉大学，硕士，2006 年。

⁵ Yihong Pan, *Tempered in the Revolutionary Furnace: China's Youth in the Rustication Movem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3.

⁶ 即 2010 年在大陆出版的《失落的一代》，这本书的中文版 2009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这本书出版后，对知青史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中文版出版后一再再版。（[法]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欧阳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年）

⁷ 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5 期。

⁸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显然，写作的动机更早。作者看到此前只靠文字材料写作的不足，因此，作者对当时的知青典型、民间领袖以及默默无闻的三种知青进行了访谈，最终将知青史的叙述、讨论延续到了后知青时代。¹知青口述史的实质就是对知青记忆的一种反映。刘亚秋通过对知青群体记忆的研究，考察了知青集体记忆是如何实现、如何反映出来的。²作为知青中的半边天，女知青也越发受到关注³，尤其是“铁骨娘”形象与女知青之间的关系⁴。另外，还有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下乡知青有哪些日常仪式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对知青下乡生活有哪些具体影响；⁵其中又具体讨论了日记这种仪式化的行为在知青日常行为中的形成和影响。⁶无论口述、记忆还是日常仪式化行为，其实都是对知青身份认同的一种反映。对于知青身份，杨国斌的论文有较为深入的讨论。⁷其实，也不难发现研究知青史、知青问题的一种趋势，即越来越重视从人（知青个体）出发的讨论。

2008年是毛泽东最高指示发出40周年，当年出现了大批知青史成果。其中关于新疆知青的就有数种，清一色为内地进疆知青的讨论⁸。此外，还有福建⁹、杭州¹⁰等地知青史的研究成果问世。与此同时，这期间还出版了不少回忆性质的著作，如《知青心中的周恩来》¹¹、《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叶维丽、马笑东对谈录》¹²等，都提及个人记忆

¹ 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² 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年第3期。

³ 刘小萌：《知青中的女性》，《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9日。

⁴ 韩启澜：《跨越性别分界：文革时期的铁姑娘形象与女知青》，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⁵ 吴艳红、[美] J. David Knottnerus：《日常仪式化行为：以知青为例的研究》，《社会》2005年第6期。

⁶ 吴艳红、[美] J. David Knottnerus：《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从雷锋日记到知青日记》，《社会》2007年第1期。

⁷ Guobin Yang, *China's Zhiqing Generation: Nostalgia,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Modern China, Vol. 29, No. 3 (Jul., 2003), pp. 267–296.

⁸ 谢敏干编：《新疆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年大事记（1963—2003）》，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年；谢敏干编：《新疆上海知识青年名人事录》，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年。陈晓凤：《上海滩新疆知青的过去和现在》，《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第9期；《王震十五次到新疆》，《兵团建设》2008年第4期；龚强华主编《湖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援疆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⁹ 陈文：《福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阶段研究（1968～1973年）》，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论文，2008年。

¹⁰ 宋涛：《难忘的岁月：杭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侧记》，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

¹¹ 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

¹² 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叶维丽、马笑东对谈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下的上山下乡运动。对这些记忆文本也有专门的述评、讨论¹。从大多数记忆来看，往往反映出苦难的记忆以及无悔的青春，对此也有不少研究。无论如何，苦难与无悔都不能构成记忆的全部，为此，刘亚秋还对知青苦难与城乡关系作了深入讨论。²

4. 2009年至今：再突破与再创新

一方面，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越发关注知青问题，另一方面，知青问题研究又表现出不足。总体来看，有影响力的深度研究仍较罕见。故在2008年、2009年，顾洪章、定宜庄、刘小萌的书再版，除2010年翻译出版了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之外，中文学界鲜见能与这些著作对话的成果。显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知青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和困难，故2008年在上海召开的“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中外学者各抒己见，指出了从学科定位、史料、视角等方面深化知青史研究的可能，³这次会议结束后还编辑出版了上中下三册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⁴，对此前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回顾。此后，确实涌现出了不少关于知青的回忆录、书信⁵以及地方资料汇编⁶，同时还有不少政协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如浙江温州⁷、舟山⁸、新疆伊犁⁹等地都出版了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资料专辑）。近年来各地出版的资料性书籍不少，其中尤以2014年出版的《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¹⁰为代表，该《辑录》对全国新方志中有关知青的史料分门别类辑录出版，对研究知青史大有裨益，对此已有相关专文介绍。¹¹当然，史料的搜集、

¹ 梁丽芳：《记忆上山下乡——论知青回忆录的分类、贡献及其他》，《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² 刘亚秋：《知青苦难与乡村城市间关系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³ 《一次还原和澄清历史的有益探索——“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综述》，《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⁴ 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

⁵ 崔积宝、李桂茹：《十年（1968-1977）：一对知青的437封情书精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陆融著、沈志明注释：《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

⁶ 杨重光主编：《怀望遥远的青春》，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⁷ 张声和主编：《温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温州知青的回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

⁸ 董瑞兴主编：《舟山文史资料（第十三辑）·青春的足迹（舟山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

⁹ 阿若甫江主编：《伊犁文史资料（第29辑）·南京知青回忆录专辑》，伊犁，2010年。

¹⁰ 金光耀、金大陆主编：《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¹¹ 金光耀、金大陆：《地方志是历史研究宝藏》，《文汇报》2015年4月17日，第14版；金光耀、金大陆：《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5期。

整理、编辑出版还在继续，而另一方面，地方知青史、专题性的知青研究也越发凸显。

各大高校、科研机构关于各地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论文不断增加。尽管这些论文多从地方出发，沿着上山下乡的背景、原因、动员、下乡安置、影响等路线展开，除地方不一样之外，其余则多显得平面化叙述，不过，这些研究又多从档案材料出发，对丰富地方知青史研究确又功不可没¹。此外，一些关于知青研究的学位论文也尝试从更为专题的角度来讨论知青史或相关问题，如城市化与知青上山下乡的关系²，知青集体记忆研究³，婚姻研究⁴，以及经济相关问题的讨论⁵，此外，还有对知青疾病问题⁶、知青慰问团与“继续革命”⁷的讨论。显然，知青史（知青问题）的研究越发突破知青本身，不断向外延伸，既丰富了对自身的研究，同时也实现了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许多关注知青现实问题的研究多是从回城后的生括入手，包括他们的收入、心理状况、社会记忆以及子女等问题。⁸实际上，近来关于知青回城又有许多新的见解，尤其是关于云南的上海知青返城问题。2009年见刊的 *We Want to Go Home!* 从内外两个方面考察了云南西双版纳知青返城的原因，同时指出中国民众的抗争文化对他们成功的重要影响。⁹同年，

¹ 详见张弘：《1968—1980年甘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2011年；王振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北援疆的历史考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2011年；吴小静：《知识青年安置研究（1962—1980年）——以甘肃省为例》，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2011年；刘丽：《湖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1968～1980）》，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2013年；张胜华：《石家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1968～1980）》，河北大学，硕士，2016年。

² 陈静：《上山下乡与福建城市化进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2009年。

³ 艾娟：《知青集体记忆研究》，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2010年。

⁴ 蔡霞：《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婚姻研究（1968—1980）》，首都师范大学，硕士，2014年。

⁵ 史金嵒：《城镇青年参加下乡教育的收益率：针对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证研究》，中央财经大学，硕士，2011年；林升宝：《文革时期上海对各相关省区知青接收地的经济行为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2011年。

⁶ 朱文静：《知青的疾病及其应对：以江西省上海知青为中心（1968～1979）》，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2015年。

⁷ 林升宝：《继续革命的困境：上海知青慰问团研究》，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2016年。

⁸ 朱孔芳、刘小霞：《上海市回沪知青子女抗逆力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0年第1期；王甫勤：《“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⁹ Bin Yang, *We Want to Go Home! The Great Petition of the Zhiqing, Xishuangbanna, Yunnan, 1978–1979*, The China Quarterly, Jun 2009, pp. 401–421.

《中国季刊》还公布了一则 Thomas B. Gold 当时对上海知青返城见闻的记录。¹

近来，对知青问题中的文化、经济问题有较多讨论。其中，知青上山下乡的书籍、阅读问题已有不少成果出现。周怡和林升宝分别以《牛虻》²、上海《青年自学从书》³为论题，考察了其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作用。孙沛东、郑瑞君则分别从阅读史的角度讨论了知青阅读情况⁴。另一方面，知青安置经费在不少成果中都有提及，但对各地安置经费的专门研究才开始起步。其中，林升宝、吕薇分别讨论了上海、北京的知青安置经费情况⁵。此外，围绕着知青输出地和安置地之间的城乡经济关系也逐渐得到关注。⁶安置经费其实也是知青管理的一部分，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则有助于了解运动的开展、组织、人员、管理等诸多问题。⁷

随着研究推进、资料增多，问题也越发明显。这些问题事实上反映出知青史、知青问题研究过程的理论与资料建设问题。对此，也有学者专门进行过相关研究⁸，如对知青有关范畴、学科定位以及知青书写等的讨论，指出在进一步研究知青史的过程中，一方面既注重资料的拓展，另一方面也注意从理论、方法论上不断推进，以指导知青史的研究。

¹ 作者1979年2月至1980年2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做交流生，因此见证了知青返城，同时还搜集了一些报道，并对相关人物有过交流、访谈。见 Thomas B. Gold, *Back to the City: The Return of Shanghai's Educated Youth*, The China Quarterly, 01 Feb, 2009, pp. 755–770.

² 周怡：《〈牛虻〉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塑造现代人格的意义》，《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年第1期。

³ 林升宝：《你还记得当年的〈青年自学丛书〉吗？》，《文汇报》2015年4月17日，第14版。林升宝：《上海〈青年自学丛书〉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⁴ 孙沛东：《文革时期京沪知青阶层化的个人阅读》，《二十一世纪》（香港），2016年8月号；郑瑞君：《“灰皮书”、“黄皮书”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的流传及其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⁵ 林升宝：《文革时期上海知青运动中的安置经费问题研究》，《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吕薇：《北京知青安置经费问题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6期。

⁶ 万绍陈：《文革时期回乡与下乡知青对乡村建设影响研究》，江西财经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2014年；Emily Honig, Xiaojian Zhao, *Sent-down Youth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o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2015. 中译本见罗湘衡译：《知识青年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经济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1期。

⁷ Helena K. Rene, *China's Sent-Down Gene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egacies of Mao's Rustication Program*,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⁸ 郑谦：《“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金大陆：《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金光耀：《后知青时代的知青历史书写》，《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胡悦晗：《拓展知青研究的几点探讨——简评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二十一世纪》（香港），2016年2月号。

二 知青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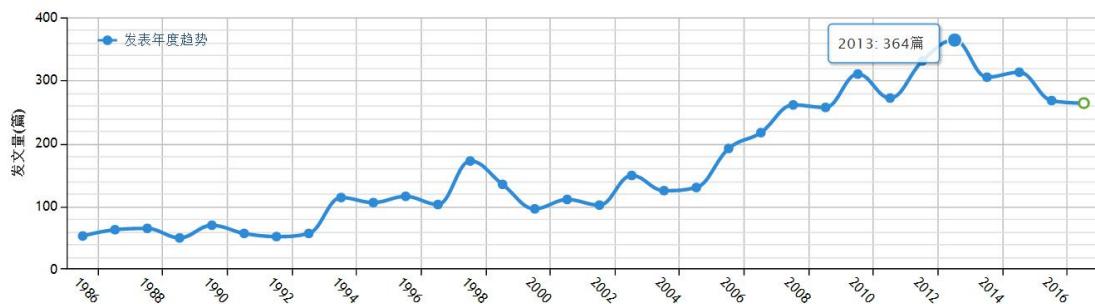
1. 整体与地方视角的双重奏

对知青史的研究，一开始都从整体切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整体层面的问题还不够清楚，对整体的研究更有助于了解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一点国内外几乎一致。随着对整体研究的持续推进，其图景日益清晰，进一步研究的困难加大。因此，更多的研究从地方入手，以更加具体、细致的论述来研究这场运动。显而易见的是，有关地方知青史的论著日益增多。尤其是近年来，地方党史办、方志办、档案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也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的地方知青史著作。2011年，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¹一书。该书既有全省整体情况的介绍，也有各个地方的情况介绍，总分结合，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各个地方的资料编纂、知青史叙述大抵也是按照类似路径展开。直到2015年，知青学者孙成民还出版了三卷本的《四川知青史》²。同样，作者也是曾经下放的四川知青。显然，知青写自己下放地知青史也成为一种趋势。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年轻学者进入知青史研究领域往往以某个地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为论题。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各大高校学位论文的选题上。在某地的高校往往以某地作为论题，如甘肃、内蒙古、湖南、上海、福建等地都有相关学位论文；或者以自己家乡作为论题，如新疆、安徽等地；或者二者兼具。总体看来，这既与整个知青史的研究进展有关，也与年轻学者更快进入研究、方便资料获取有直接关系。

显而易见，知青史的研究呈现出整体史论述的衰落，地方知青史研究方兴未艾的态势。但无论如何，这都在于促进知青史的研究。即便是从地方入手，也还是在于从地方视角来看待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从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来理解地方知青史。也因此，知青史的研究成果才能持续增长。

¹ 杨泽宇主编：《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² 孙成民：《四川知青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



1986年至2016年CNKI（中国知网）收录以“知青”为主题的文献概况

数据来源：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scdb&action=scdbsearch&db_opt=SCDB

1986年至2016年，“中国知网”共收录了5017篇以“知青”为主题的文献，仅2013年就有364篇。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不难发现中文学界对知青问题研究的热衷。尽管知青问题研究总体上看来呈上升态势，但也不断波动，由此也可进一步探讨其变化。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从整体和地方视角切入外，往往还在论述中就某一个、或多个专题进一步阐释，或在专题中融合整体与地方，对知青史的研究起到了直接推进作用。

2. 上山下乡的原因

所有关于知青问题的讨论都无法避免知青上山下乡原因的讨论。这些原因归纳起来大抵有以下几种：

(1) 经济原因(就业、城市发展等)。这一点在英语学界早期研究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中很常见。研究者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人口高自然增长率情况，尤其是城市新生婴儿到1960年代中期成长为青年(16岁)后需要升学、就业，而高中学校、城市工业战线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因此不得不将这些青年下放。¹由此，有论者沿着这条分析思路，以上海为例讨论了上海工业战线的变化，及其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情况；²也有论者以上海为例，分析了

¹ Pi-chao Chen, Overurbanization, Rustication of Urban-Educated Youths, and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 No. 3 (Apr., 1972), pp. 361-386.

² Paul E. Ivory and William R. Lively, Rustication, Demographic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sian Survey, Vol. 17, No. 5 (May, 1977), pp. 440-455.

上海工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变化：建国前主要以国际市场为主，一方面从国际市场获取原料，另一方面则出售商品，新中国成立后切断了这条线，因此上海的就业岗位减少，新政府除疏散这些失业人口外别无它法。¹显然，当时国外学者还不能方便获取资料，一些研究成果也正是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出现，这难免影响到对知青上山下乡原因的判断。不过，这些学者几乎全都是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角入手，是从社会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看到了上山下乡的症结所在。故作出此判断。确实，这些问题都真实存在，故后来还有不少学者沿着这条思路继续分析下去。

(2) 政治动因。辛平从毛泽东与农民的关系角度来认识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动（1997年）。邓鹏则认为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是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各级领导一再将上山下乡这种经济权宜之计包裹上浓墨重彩的政治包装，因此，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不过是毛泽东乌托邦理想的失败。²这一点显然是对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的经济原因说的颠覆性挑战。长期以来，西方世界认为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研究者对此说显然已经疲乏。潘鸣啸则要挑战西方这种盛行的看法。潘鸣啸认为上山下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因素，因为知青下乡的同时工业战线上还从农村招收了大量工人。³

(3) 综合原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动因）。其实，论者讨论经济原因、政治原因都绝非单纯从这两点出发，他们也看到了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只不过更有所侧重而已。前面提到一些西方学者讨论经济因素，提到社会结构问题，但也提到意识形态的考虑，只不过他们身处域外，难免矫枉过正。譬如，有人就认为知青下乡与1942年的知识分子工农化和1957年干部下放如出一辙。⁴更有甚者，认为知青下乡与美国、日本输送城市人口到农村一样，没有什么新奇之处。⁵显然，知青上山下乡绝非单一因素。有论者就将

¹ Lynn T. White III, The Road to Urumchi: Approved Institutions in Search of Attainable Goals during Pre-1968 Rustication from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9 (Sep., 1979), p. 486.

² 邓鹏：《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与乌托邦理想》，《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4期。

³ [法]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第22-61页。

⁴ Gopa Joshi, Youth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tist*, Vol. 9, No. 1 (Aug., 1980), pp. 33-46.

⁵ Pi-chao Chen, Overurbanization, Rustication of Urban-Educated Youths, and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知青进疆置于移民大军之中，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援疆出于多种因素考虑。¹诚然，没有人否认多种因素对上山下乡的决定作用，但反过来看，综合原因也可能等于没有说明原因，因为横竖都有道理。

除以上三点外，也有论者从上山下乡的主体知青来讨论上山下乡的原因。刘小萌认为老三届上山下乡的思想原因，在于受到新中国教育、文化的影响。²叶青也同样从知青角度分析知青上山下乡的社会心理因素，包括知青本人出于对领袖的敬仰和盲从、无孔不入的社会宣传动员、强制半强制的组织动员体系等。³

尽管关于原因的讨论成果很多，但似乎谁都难以说服谁。因此，关于上山下乡的分期也存在较大争议，尤其是对文革前后的争议更大。循着上山下乡的原因，也就不难发现对其评价的巨大分歧。大多数论者认为文革前的上山下乡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则错误不少。但定宜庄认为，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一部辉煌史、业绩史，而是凝结了不止一代人的血泪，文革前的知青比此后的上山下乡更为沉重。⁴确实，无论是文革前后，作为主体的知青个体可选择性的余地都很小。正因如此，所以才应该进一步探讨知青上山下乡的原因。大到整个社会结构，小到个人，都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郑谦认为上山下乡有四块基石：“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泛道德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当代回声、对书本知识和正规教育的轻视和对直接经验的推崇、对城市化认识的滞后。同时也指出，对于上山下乡的原因，要区别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看法、要区分运动的前期和后期。⁵换言之，就是要对上山下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实如此。就笔者对上海知青支援新疆兵团的初步研究，就不难发现新疆兵团在吸纳上海青年的同时，也提出了大量技术人才、物

The Case of China, p. 386.

¹ Agnieszka Joniak-Lüthi, Han Migration to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Between State Schemes and Migrants' Strategies,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Bd. 138, H. 2, Special Issue: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Central Asia (2013), pp. 155–174.

² 刘小萌：《“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的缘起》，《文史精华》1998年第9期。

³ 叶青：《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心理探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⁴ 定宜庄：《关于〈中国知青史〉的初澜》，《中国青年研究》1998年第5期。

⁵ 郑谦：《“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资支援的要求。¹因此，就具体的案例来看，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地的选择也有许多具体的原因。

3. 回城

从下乡到回城凸显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转折，充满了诸多影响时代变迁的因素。因此大家对知青回城的关注度极高，近来更是热度不减。只不过，对回城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

现在来看，对回城的典型事件有一定研究，如云南、新疆的上海知青大返城。早在1979年，Anne McLaren 因当时在上海交流，因此对上海知青回城所张贴的大字报有过细致分析，认为这些大字报的实质是对当时政治文化和现实问题的反映。²对知青大返城的叙述，更多的还是见之于纪实文学、小说等文学作品，专门研究不多。2009年《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刊登了杨斌关于云南上海知青回城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从多个方面对知青成功回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民众抗争文化对知青成功回城的重要影响。当然，返城也有诸多现实原因，这些原因遍及政治、经济、文化。³同时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云南知青返城就受到了中越自卫反击战的重要影响。⁴

尽管知青大返城的原因很多，但就云南、新疆两地来说还不完全一样。当然，新疆上海知青受到云南的影响，但新疆的上海知青现实困难与云南知青还不完全一样。新疆上海知青作为文革前上山下乡的重要组成部分，婚育率很高，⁵因此其主要问题在于子女成长，故后来很多问题的讨论就围绕子女来展开。云南知青作为文革后上山下乡的知青，其现实问题主要还在于生活之苦。

由知青大返城导致政策松动，最终终结知青上山下乡。但在落实政策时，具体到个人的返城经历，则又千差万别。因此，对个人返城的讨论，不单是高考、招工这么简单。

¹ 《关于请求上海支援技术、物资的信（原件无标题，标题为引者所加）》（1963年11月21日），上海档案馆，档号：B127-2-784。

² Anne McLaren , *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ember 1978 to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 (Jul., 1979), pp. 1-20.

³ 潘一：《知识青年大返城风潮动因探寻》，《青年研究》1994年第3期。

⁴ Yihong Pan, *Tempered in the Revolutionary Furnace: China's Youth in the Rustication Movem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3, pp. 224-231.

⁵ 《上海支边青年情况综合统计表》（1981年10月10日），新疆兵团档案馆，档号：004-07-0725。

一开始，对知青回城问题的讨论主要还是关注知青子女的回城问题。1989年，《社会》杂志就发表了一篇关于知青子女返城问题的讨论。¹这种问题又集中在上海。包括知青子女入学问题、回城后的心理状态等。必须承认，关于知青回城的讨论还远远不够。尽管大家已经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对回城有一定了解，但对知青群体的抗争、知青家庭的角度来看回城还没有很好的成果。毕竟，知青回城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不只是对整个城市、社区，更是与自己的家庭有着直接关联。家庭吸纳知青回城，家庭也因此向单位要福利，要求单位安置知青子女。²而知青回城后的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沿着回城的轨迹，也可以追踪某地、某个体的发展情况。如今，知青陆续从工作岗位退休，曾经下放某地的知青会定期聚会，或编写回忆录等，为研究回城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另一方面，对文革期间回城的讨论不足，也缺乏对留在农村知青的讨论。王爱云从子女顶替就业制度中专门分析了知青回城问题。³但这样的成果毕竟不多。此外，对文革中通过招生、参军等方式离开农村的研究就更少了。刘小萌、定宜庄等人讨论过文革期间老知青回城问题，如果将这次回城与之后的大返城联系起来，进行既有综合又有细节的讨论，对理解上山下乡运动无疑有巨大帮助。文革期间除返城之外，还有不少知青留在农村参加文革，这类成果也不多见⁴。知青政策结束后留在农村的知青更是出于失声状态。因此，对知青回城问题的研究迫在眉睫，由此也可以衍生出诸多问题。

4. 知青婚姻

1994年，刘小萌发表了对知青婚姻的专题研究。在文章中，作者对知青的婚姻政策、婚姻人数、婚姻类型、已婚知青的难题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⁵随后，在收入《中国知青史》时，作者对婚姻这一章节有了更完整的讨论，尤其是从社会现实问题入手，对诸多难

¹ 孙围华、徐有威、巴地：《第二人生——知青子女返城问题透视》，《社会》1989年第12期。

² 陈映芳：《国家与家庭、个人——城市中国的家庭制度（1940—1979）》，《交大法学》2010年第1期。

³ 王爱云：《试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子女顶替就业制度》，《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⁴ 陈意新：《老知青与农村文革运动——安徽省祁门县大坦公社的案例（1966—1968）》，《二十一世纪》（香港），2013年12月号。

⁵ 刘小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青年研究》1994年第8期。

题有着细致分析。知青下乡确实遭遇了很大的现实困难，尤其是插队落户到农业生产队的女知青困难更大，因此，有不少女知青选择与农民结婚，以此来逃避高强度的劳动负担和生活困难，同时也有女知青因政治原因而选择与农民结婚¹。由此，在文革中树立了许多知青与农民结婚的典型，这些典型也进一步影响着知青婚姻。

蔡霞通过对知青婚姻的研究发现，知青婚姻在1973年前后有明显变化，同时也认为知青婚姻政治化，这体现出个人与国家公权力的博弈；与非知青相比较，知青婚姻自由化、不稳定性程度高，婚前性行为开放程度高，知青婚姻的功利性。²当然，作者之所以有此认识，也与她所选择的分析样本有一定关系。不过，将知青婚姻作为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博弈，不失为研究知青史的一个好视角。2015年，李秉奎所著《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其中第四章就讨论到知青的“婚”与“不婚”。³将知青婚姻放在当时整个社会婚姻实态中去观察确实很有必要，既要注意到知青婚姻的特殊性，同时也需要看到知青婚姻与安置地（农村）、城市同龄人婚姻的异同。

即是说，知青婚姻要有时间纵向对比，也要有范围横向对比。目前大抵认为，插场、下放兵团的知青互婚的比例较高，插队知青“农婚”（知青与农民结婚）比例偏高。实际上，有学者根据地方志的初步统计，也发现了各地结婚率的差异性。通过这种差异性进一步追问，可以发现当地社会结构对结婚率的影响。如知青结婚率高的浙江省绍兴地区，其较发达的农村经济、紧密的亲缘关系对知青婚姻有重要影响。⁴

当然，要进一步推进知青婚姻问题的研究，也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包括社会性别（gender）理论等。依据数理统计、抽样调查的方法，就有论者对下乡女性在第一次结婚年龄有过研究，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推迟了中国女性的第一次结婚年龄大概1.2年。1700万知青下乡，生活在边远贫穷的乡村使得他们难以向成年期过渡，这也不可避免打乱他们

¹ 李巧宁：《女知青与农民婚姻的历史考察》，《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

² 蔡霞：《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婚姻研究（1968—1980）》，梁景和主编：《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1—265页。

³ 李秉奎：《狂澜与潜流：中国青年的性恋与婚姻（1966—197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⁴ 金光耀、金大陆：《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5期。

的正常生活。¹此外，婚姻更多的问题还是涉及个人隐私，也牵涉现实问题，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困难不少。如何进一步拓展这方面研究，需要在公与私、个人家庭与国家社会之间寻求突破。

5. 经济问题、城乡关系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经济问题首先就是安置经费，因为这不但关系知青个人，也涉及城乡、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关于安置经费，较早是从宏观层面给出统计数据，或就大的问题展开讨论，近来对安置经费的研究更加细化，主要是以地方入手进行研究。林升宝通过对上海知青安置经费研究后发现，安置经费由经济手段逐渐变成一项政治策略，安置经费所暴露的问题也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的不可持续性。²北京知青安置经费的问题与上海一样，其主要问题在于开源不足、开支巨大，从而衍生出一系列问题，给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带来很大困难。³这也表明知青安置经费确实存在通病，但是，也不能忽视经费在不同地区，甚至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

安置经费固然重要，但这绝非知青输出地一方的事情，这往往涉及输出地和安置地双方，中间还横亘着国家机器。围绕着经费的调拨、使用，既可以进一步考察三者的关系，同时，也可进一步探知知青在其中的作用。如此一来，城乡关系、地区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纳入研究视野。事实上，讨论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因就涉及城乡关系论，但主要还是从宣传话语的消灭“三大差别”入手，对知青上山下乡与城乡关系缺乏实质性的研究。

长期以来，不少观点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因为许多农村地区本就人多地少，本地居民尚且无法满足，知青到来只会增加额外负担。张化的研究对此有很好的证明⁴。而且，知青回城后多年回忆起农村生活时，仍对农村生活之苦有深刻记忆。这种记忆正是农村内在苦难的一个镜像。知青苦难的更基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

¹ Shige Song & Lu Zheng, The impact of the sent-down movement on Chinese women's age at first marriage, DEMOGRAPHIC RESEARCH, MAY 2016, pp. 797–826.

² 林升宝：《文革时期上海知青运动中的安置经费问题研究》，《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³ 吕薇：《北京知青安置经费问题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6期。

⁴ 张化：《建国后城乡关系演变刍议》，《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城乡关系问题。¹其反映出的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差距。这也进一步说明，既然乡村不如城市，知青的到来显然加重了农村的负担。诚然，这一点必须承认，但也要看到中国之大的差异性。对于不同地区，尤其是上海、北京等主要以跨区安置知青的地区，往往又能通过多种方式去帮助知青安置地改善生产生活，在某种层面改善了城乡关系。林升宝通过考察文革期间知青输出地上海对相关安置地区的援助，发现了上海的援助力度之大、内容之多，涉及经费、物质、银行贷款、药品等方方面面。²由此可以看到知青输出地的主动支援。与此同时，也可以发现另一方，安置地的干部、知青本人也利用这种输出—安置关系来为安置地争取资源。这在韩启澜、赵小建的最新研究中就有明确体现。她们的研究主要以知青输出地上海为中心，讨论了上海与其他知青安置地之间特殊的城乡经济关系。³对江西省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也有类似证明，认为知青从劳动力、乡村试验、教育等方面给乡村建设带来了帮助。⁴这在知青个体中也能找到类似证明。北京知青马戎（现民族学学者）文革期间下放到内蒙古牧区。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无意中构建起草原蒙古族社区与北京之间的感情纽带”，这些知青当时与蒙古族牧民朝夕相处、相互影响，直到今天还能互相往来。⁵确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往往都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跨区安置知青。⁶这本身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无论是就知青上山下乡与农村还是与城市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并不充分。虽然也有一些研究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知青上山下乡，认为新中国对城市的定位决定了上山下乡的必然，也就是常说的“反城市化”、“逆城市化”。的确，事情本身就是如此。但知青下放对城市发展的具体影响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尤其是将知青下放与返城结合起来看待这

¹ 刘亚秋：《知青苦难与乡村城市间关系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² 林升宝：《文革时期上海对各相关省区知青接收地的经济行为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2011年。

³ Emily Honig, Xiaojian Zhao, *Sent-down Youth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o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2015.

⁴ 万绍陈：《文革时期回乡与下乡知青对乡村建设影响研究》，江西财经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2014年。

⁵ 马戎：《构建新型民族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⁶ 笔者家乡在川东北农村，小时候就听长辈们说起过镇上到村子里插队的知青故事。当时从镇上到村子里插队的知青生活非常艰苦，往往只能靠村里农户接济。然而，多年之后并没有知青再回过村子里。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在本地（本镇）插队？所以，关于城乡关系的讨论，可能还需要纳入更多的案例，范围也应扩大。

件事情，可能会收到不一样的效果。

6. “人”的研究

不可讳言，所有知青问题的研究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的研究。如对“老三届”的研究，就是将论题放在这群特殊人群的身上。众所周知，“老三届”是1968年12月毛泽东最高指示下发后第一批下放知青，也由此实现了红卫兵向知青身份的转变。中国大陆进入知青问题研究就从“老三届”入手。随后，金大陆出版了两本关于“老三届”的著作，其中一本是关于老三届的访谈文章汇编，有老三届自己人生道路选择的感悟，也有老三届之外（老师、青年、知识分子等）对老三届的看法。¹另一本则是关于老三届生存发展的考察，从老三届的出现谈到他们当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²无论怎样，在谈到“老三届”这个话题时，必须要直面的就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研究知青身份也有不少成果，尤其是当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研究者根据知青上山下乡经历及记忆所展开的研究，让知青身份变得“复杂”起来。当然，简单地理解知青就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后知青时代对知青的认同却更为丰富。有论者就从心态和意识形态两个视角出发，来讨论从知青个体的自我认同到“青春无悔的老三届”群体肖像形成的历史过程。包括怀旧、现实生活、“老三届文化热”等因素在内，共同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青春无悔的老三届”的群体肖像形成。³虽然这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老三届的“青春无悔”，其实却关系知青回城后的生，以及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评价。在文学作品中，知青的形象也在不断演变。⁴知青形象的建构受到的关注颇多⁵，也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实际上，知青个人对“知青”身份的认同也在不断变化，这

¹ 金大陆：《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²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³ 黄玉琴：《“青春无悔的老三届”：从自我认同到群体肖像》，北京大学，硕士，2003年。

⁴ 王源：《试论知青形象的流动与演变》，《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⁵ 韩启澜：《跨越性别分界：文革时期的铁姑娘形象与女知青》，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黄巍：《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论文，2012年，第46-56页。本书2016年出版。

种变化就在现实生活中流转，尤其受到知青团体活动和社会现实的影响。¹

此外，国家领导人和知青典型人物也得到了一定研究。已有论者利用公开资料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与知青的关系进行研究，要从这方面突破有一定难度，毕竟资料有限。当然，也并非没有突破的可能，关键在于视角转换和理论提炼。与知青相关的典型人物，如知青家长李庆霖也有专著出版²，但知青个人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常见的就是知青的口述材料、回忆。当然，个体知青的研究还有一定难度。在研究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到知青中的“被遗忘者”³。

知青群体既是一个整体，同时也有分层、差异。由“血统论”派生出可教育子女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就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下乡后给他们带来的摧残更大。⁴由此，也可进一步去寻找知青的差异性，包括同一地区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的差异。与此同时，也有论者研究上山下乡期间的青年思潮，包括对青年读书、思想、青年对政策的思考等方面的探索。⁵也就是说，知青与上山下乡运动之间有一个互动的过程。这种互动对知青之后的生活有直接影响。有研究发现，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尤其是女性，比较容易接受毛泽东所谓的阶级冲突下的共产主义的概念；但也同时发现，上山下乡的民众更会对共产政体的表现以及其结构进行批判。⁶

就知青中“人”的研究来看，还有太多不足。包括从人口学、人类学、人际网络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太多需要做的工作。

7. “新史学”、新视角、新话题

¹ Weiyi Wu, Fan Hong, *The Identity of Zhiqing: The Lost Generation*, Routledge, 2016.

² 黄志雄：《知青家长李庆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

³ 2006年、2009年，邓鹏编著的《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1964～1965）》（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无声的群落（续）：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先后出版。在邓鹏看来，1964～1965年两万多名到川东北大巴山落户重庆知青就属于被忽略的群体。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文革前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回乡知青就属于“被遗忘者”。还需要指出的是，知青当中的非典型，亦即普通知青，他们也属于“被遗忘者”，但他们身上往往更能展现一代人的历史。

⁴ 刘小萌：《“血统论”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青年研究》1995年第2期。

⁵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0～276页。

⁶ Robert Harmelal, Yao-Yuan Yeh, Attitudinal Differences with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hort: Effects of the Sent-down Experience,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16, pp. 234～252.

近年来，由于受到历史研究路径的转向，以及其他学科的影响，知青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局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知青阅读史、书籍史的研究出现。周怡通过对小说《牛虻》的考察，分析了它对知青的影响。¹郑瑞君考察了“内部图书”如何在知青中传读，以及对这些书对知青思想变化的影响。²孙沛东以文革时期京沪两地干部家庭和知识分子两个阶层子弟阅读的变化情况为论题，从而发现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阅读欲望更大，阅读范围不断扩大，从城市到农村、由精英阶层向工农阶层扩散。而这种个人阅读也为知青本人积累了文化资本，促进了今后的个人发展。³林升宝则以上海《青年自学丛书》为话题，根据相关档案材料廓清丛书出版的台前幕后，来讨论丛书与政治的关系。⁴当然，知青阅读史、书籍史目前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可以继续讨论的话题。

其实，从知青阅读史、书籍史的研究中就可以发现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的交织，这在知青史、知青问题研究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明显体现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上。社会学研究知青问题，一个重要的关照点就是知青记忆问题，这方面涌现出了大量成果。如杨国斌对知青身份与记忆、怀旧文化的研究⁵，刘亚秋对知青社会记忆的研究⁶；杨晓明的《知青后代记忆中的“上山下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传递与建构》⁷、艾娟的《知青集体记忆研究》⁸等。都通过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来讨论知青的社会记忆问题，从中发掘苦、无悔、代际传承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在国家、家庭、团体与个人之间形成、传播。此外，还有论者借助社会学、心理学对知青的日常仪式化行为进行研究，从而发现这些仪

¹ 周怡：《〈牛虻〉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塑造现代人格的意义》，《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年第1期。

² 郑瑞君：《“灰皮书”、“黄皮书”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的流传及其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³ 孙沛东：《文革时期京沪知青阶层化的个人阅读》，《二十一世纪》（香港），2016年8月号。

⁴ 林升宝：《上海〈青年自学丛书〉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⁵ Guobin Yang, China's Zhiqing Generation: Nostalgia,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Modern China, Vol. 29, No. 3 (Jul., 2003), pp. 267-296.

⁶ 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年第3期；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

⁷ 杨晓明：《知青后代记忆中的“上山下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传递与建构》，《青年研究》2008年第11期。

⁸ 艾娟：《知青集体记忆研究》，南开大学，社会学，博士，2010年。

式化行为在知青生活中的形成及意义。¹也有研究从现实的角度考察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山下乡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知青比非知青的生活幸福感程度要低，在知青内部，返城时间是他们阶层分化和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因素。²对此也不乏怀疑者。有论者就从就业、工资收入、医疗保障等方面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解答。³

也有论者从移民史、城市化的角度来讨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样一来，对其研究和评价则又有所不同⁴。还有论者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移民问题一直存在，知青上山下乡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对这种体制安排下的移民有横向、纵向对比，也能更好理解上山下乡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影响⁵。葛剑雄则提出要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研究上山下乡运动。⁶当然，移民、人口往往也被置于历史地理的考察范畴，但以历史地理视角来看，如果真能用地图直观展现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变迁，对研究知青史、知青问题的确善莫大焉。

知青史研究的诸多新话题，目前有许多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如知青疾病问题、知青下乡后的生活问题⁷等，这些关注都较少。当然，也跟资料不易获得，内容分散有直接关系。如果能借助于相关学科来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将对整个知青史的研究有很好的推进。

三 资料与理论方法：知青史研究的突破与瓶颈

1. 资料的拓展与限制

¹ 吴艳红、[美] J. David Knottnerus: 《日常仪式化行为：以知青为例的研究》，《社会》2005年第6期；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吴艳红、[美] J. David Knottnerus: 《日常仪式化行为的形成：从雷锋日记到知青日记》，《社会》2007年第1期。

² 王甫勤：《“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³ QIANHAN LIN, Lost in Transformation? The Employment Trajec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46, Transitioning to Adulthood in Asia: School, Work, and Family Life (MARCH 2013), pp. 172-193.

⁴ 陈熙：《中国移民运动与城市化研究（1955~1980）——以上海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2014年。

⁵ 游海华：《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剖析——以赣闽粤边区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⁶ 葛剑雄：《“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地理考察》，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第6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22页。

⁷ 在一些著作、回忆录当中，往往都会提及下乡后的生活，但都不够深入，还不足以揭示问题。如下乡到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只是比较简单的介绍。见何岚、史为民：《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第246-310页。

知青史研究能有新的突破，主要就在于资料的不断拓展。从整个知青史的研究来看，资料建设工作伴随着知青史研究的始终。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编辑的《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至今还是知青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随后，1995年问世的《中国知青事典》也条分缕析地对知青相关问题作了详细介绍。次年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更是知青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正因这些资料性质图书的编辑出版，才有了知青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但是，仅仅靠这些资料还远远不够，因此还需要补充相应的口述、报刊资料、方志、档案材料等。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出版了两卷的《中国知青史》。1980～1990年代国外学者鲜有人问津知青这个话题，主要也是因为能够找到的资料有限所致。¹

两卷《中国知青史》出版后整个知青史研究缓慢，预期的研究高潮并未出现，也是因为资料的限制。²确实，关于整个知青史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才刚起步。如2014年出版的《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³，该《辑录》对全国新方志中有关知青的资料分门别类辑录出版，为查找某地的知青历史有直接帮助，为此已有相关文章介绍和讨论⁴。当然，仅靠地方志还不足以支撑知青史的研究，于是，对档案、书信、日记、工作笔记、口述材料等资料的进一步开垦也就刻不容缓。当然，也并非说对于这些资料的开拓就没有进展，毕竟，这么多年来以知青为论题的各种成果都注重对这些文献的收集、利用。以近十年来的学位论文来看，这些论文不但注意对档案文献等文字资料的收集、利用，而且也辅之以相关口述资料。但是，从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也不难发现高度的同质性问题。尽管地方不一样，但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主题一样，政策的贯彻一样，形成的文献也类似，由此而展开的研究也就难免“千篇一律”。从各地出版的有关知青的文史资料选编来看，也难免有类似情况。不过，毕竟中国之大，知青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从这些浩繁的

¹ 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² 金光耀、金大陆：《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5期。

³ 金光耀、金大陆主编《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⁴ 金光耀、金大陆：《地方志是历史研究宝藏》，《文汇报》2015年4月17日，第14版；金光耀、金大陆：《从地方志资料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5期。

资料中，也可以发现不少闪光之处。尤其是不少地方还出版了相应的档案资料汇编，这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学者们还对各地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以提纲挈领的形式编写了大事记，这样一来就有助于从时间脉络上来观察各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谢敏干对新疆上海知青上山下乡的大事记的整理¹，吕巧凤、谢春河对黑龙江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的整理²，金大陆、林升宝对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的整理出版³，姚靖江对北京知青大事记的整理出版⁴。这些大事记以相关文献材料为基础，有助于对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整体把握和理解。

与此同时，大量知青回忆录的出版⁵，也为研究知青史提供了方便。回忆录与口述访谈一样，是关于知青个体最贴切的记忆，起到了档案文献等资料无法替代的作用。在写完《中国知青史》后，刘小萌就意识到单靠大量文献无法展现整个知青的历史，尤其是他们回城后的生活无法反映出来，于是，他就此进行了大量口述访谈，最终完成了《中国知青口述史》一书。刘小萌认为，“口述文献互证，以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许多版本”。⁶事实上，由于文献资料难以获取，加之文献资料的缺陷，以及知青日渐老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口述材料的重要性，为此大声呼吁搜集当事人的口述材料。⁷近年来不少研究知青问题的成果一开始就以口述访谈为主，由此来提炼主题、提出问题，也能收到出奇的效果。这些研究成果跨越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体现出对知青问题的整体关怀。当然，口述访谈也有其缺陷，因此，除口述对象样本的选择需要考虑外，深度访谈自然必要。此外，社会科学往往以一些理论将这些口述材料笼罩起来，从中提出一些大的问题，如对“知青记忆”的研究。现在做口述访谈，大抵都能意识到对这类资料

¹ 谢敏干编：《新疆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年大事记（1963-2003）》，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年。

² 吕巧凤、谢春河主编：《黑龙江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

³ 金大陆、林升宝：《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1968-198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

⁴ 姚靖江：《青春履痕：北京知青大事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⁵ 关于大量出版的知青回忆录，刘晓航已有过详细分类和讨论。详见刘晓航：《从集体记忆到个人自述：40年来知青回忆录的演变》，华夏知青网，网址：<http://www.hxzq.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9926>

⁶ 刘小萌：《关于知青口述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⁷ 郝欣、曾江：《知青研究亟待记录当事人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31日，第A02版。

批判看待的重要性，尤其是口述记忆的社会性与个性化¹。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资料搜集的重要性，但也发现了资料搜集当中出现的难题。如档案文献的同质性问题，关键材料无法查阅，口述材料浮泛，等等。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硬性条件，有些暂时可能还无法改变，有些通过努力可以取得进展。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一些资料也可以在网上方便查阅，这也有助于研究知青史。

2. 学科交叉与理论方法提炼

“上山下乡运动”与“知识青年”，这是互相紧密联系又不能完全等同的两个概念。²但是，目前来看，大多数人就是将知青等同于上山下乡运动，甚至还有不少人将知青等同于红卫兵，网上因此还出现了对知青的恶评。这与学术界对知青历史的研究不足有很大关系。其实，一直有学者从知青史学科建设上推进相关问题的讨论。2008年在上海召开的“2008知青学术研讨会”上，朱政惠就提出要建立“知青学”，其后，他又专门从三个方面提出要以学术研究来恢复知青本来面目。其一，应该全面回顾和整理相关业已取得的成果，看看它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有些什么重要著作，有些什么思维特点，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其二，需要从理论和方法上来把握对它的研究。其三，从史学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条件考虑问题。³

就知青史研究来看，还有许多范畴不是很清楚，尤其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社会发展中一些问题的具体关系。就此，有论者对上山下乡与文革的整体关系、下放的主要动因、下放的理论依据、“青春无悔”、知青下放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⁴这样关于一些理论问题的具体讨论，有助于廓清知青史当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扩展知青史的讨论空间。一直以来，知青研究并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因此不断有学者呼吁要从让知青问题研究进入到历史学的轨道，标树以史料开发和史实重建为中心的

¹ 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2010年第5期。

² 刘小萌、定宜庄：《〈中国知青史〉作者谈〈中国知青史〉》，《青年研究》1998年第3期。

³ 《以学术研究恢复知青本来面目》，《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12日，第6版。

⁴ 郑谦：《“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研究进路，构建以问题解答为中心的研究框架。实现社会生活史与政治运动史的交叉。¹

不管是知青范畴还是学科定位，存在争议也很正常。不管是哪一个学科进入知青问题研究，首要问题是捕捉资料无疑，因此，“以史料开发和史实重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确实很有必要。另外，各种学科相互交叉讨论也很有必要。刘小萌也认为，由于知青相关文献档案浩如烟海，因此，历史学的研究具有一定优势，但与此同时，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展开多角度研究与合作也势在必行。在这方面，性别研究（主要是妇女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²确实，不同的学科关注的问题不一样，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整体认知。政治学往往关注上山下乡的政策、管理问题；社会学则关注知青回城后的生活问题，以及社会记忆、代际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被历史学所关注；文学关注知青文学的种种；美术学则关注知青上山下乡的图像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目前，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故2013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知青一代的历史与记忆”学术工作坊上，汇聚了各个学科研究知青的学者，就知青上山下乡话题展开讨论。³

韩少功认为，就是要以更多角度对知青写作进行研究，结论就不会简单。结论不简单很重要。⁴他所讨论的是知青文学问题。但就整个知青研究而言，多角度、多学科的讨论也就是要让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丰富，富有层次。事实上，目前多学科进入不假，但学科之间尚存壁垒，并未就问题本身很好地进行对话。

知青历史记忆需要传承，知青历史需要书写。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对知青历史的书写以三种形式展开：其一是知青的文学书写，其二是知青的历史研究，其三则是知青的民间书写。三种书写形式在时序上交错，但进行书写的作者大多数本身就是知青。因此，他们对历史本身的把握更为深刻。但现在这种情况还能延续的时间有限，因此有学者呼吁要让更多年轻人进入知青史的书写当中。⁵随着时光流逝，知青逐渐在离开工作岗位，⁶他们中

¹ 金大陆：《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

² 刘小萌：《知青中的女性》，《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9日。

³ 田波澜：《知青史研究不能用怀旧代替反思》，《东方早报》2013年12月17日，第A26版。

⁴ 石剑峰：《知青运动是一种“高仿”现象》，《东方早报》2013年8月16日，第B03版。

⁵ 金光耀：《后知青时代的知青历史书写》，《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

也有不少人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其中重要的一段知青经历必不可少。加之现在网络日益发达，许多老知青团体都建立了自己的知青网站、推出了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发布关于自身上山下乡的种种经历。目前关于知青历史叙述的声音非常多，但其中有一种较强的声音就是“青春无悔”，有学者更是将这种现象概括成从“青春梦魇”到“青春梦想”的变化¹。事实上，知青之间的下乡经历和记忆往往也有一定差异。在知青的回忆及其异同之间，许多历史信息自然会不断展现，非知青学者自然可以捕捉到很多有用的信息，更好地书写知青史。不过，研究成果也需要面对知青，但成果难免会与知青们的记忆和认知有一定的冲突，这也给非知青学者一定的挑战。挑战同时也来自知青史的学科、理论建构。用学术研究的方式来书写知青史本身也面临着学科的自我反省和自我突破，这种挑战也与知青史的研究相伴相生，更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连。

四 结语

通过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观察，大家都认识到，知青的命运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²通过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考察，也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好认识中国。³尤其是知青本人上山下乡的经历，成为其一生当中重要的记忆，而这种体验往往又影响了知青的人生轨迹。⁴显然，知青史、知青问题研究之重要性毋庸赘言。

从整个知青史的研究来看，尽管有不少重复工作，但其研究成果精彩纷呈，不断涌现的新成果说明了知青史研究的极大魅力。同时，从知青史研究中，也不难发现其学科壁垒的消减，这一方面自然受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自身学科发展的反思，但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因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距离今天时间近，本身所蕴含着大量需要研究的

¹ 项飚：《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文化纵横》2015年第6期。

² 雷颐：《知青述事：“青春梦魇”如何成为“青春梦想”》，2016年10月5日，北京知青网论坛，网址：<http://bbs.bjzqw.com/dispbbs.asp?boardID=204&ID=108029&page=1>

³ [法]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第422页。

⁴ 郑谦：《“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⁴ 陈家琪：《一代浪漫主义受难者的知青记忆》，《二十一世纪》2013年6月号。

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又相互纠葛，并非哪一个学科就能解答。但知青研究首先还是要做好资料工作，借着不断搜集到的资料来丰富对知青的认知，从而从中提炼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就资料搜集、整理、研究来看，目前一方面主要是抓文献资料的发掘，尤其是档案文献的发掘。事实上，这一方面所遇到的难题不少。首要一点，主要是因为问题“敏感”，时间距离近。笔者走访上海、北京、天津、新疆等地档案馆，发现这些档案馆对知青史资料的开放程度大不一样，但总体而言，开放程度较低，甚至有的地方完全不开放。当然，对这方面材料的开掘必不可少，需要长期坚持，用力恒久方才见效。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如何，这些材料终究待在档案馆中，而另一种口述材料则亟待收集。

在资料的基础上，再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具体问题置于大的社会背景、社会结构下展开研究。如此一来，也是从社会看知青，从知青看社会的互动。这样，才有助于更好地展现知青的特质，以及知青史的研究意义。■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 行